《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
1957年9月第一版

目　　录

一、言論、信件

二、揭發材料

三、儲安平交代的材料

四、儲安平的簡历

五、附件

《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
1957年9月第一版

一、言論、信件

在6月1日統战部座談会上的發言

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見

解放以后，知識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領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須調整的一个問題。这个問題的关鍵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鍵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問題上。我認为党領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沒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証政策的貫徹，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樞紐，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組，都要安排一个党員做头兒，事無巨細，都要看党員的顏色行事，都要党員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責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旣沒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張。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員，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員安置在各种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現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淸一色局面。我認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义現象的最終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現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組織紀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

央的領导有沒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尙提了不少意見，但对老和尙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見：解放以前，我們听到毛主席倡議和党外人士組織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兩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說。現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結党外人士、团結全国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国內和国際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党的領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貢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緩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調，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融融乐乐各得其所，这些問題，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慮解决。

（光明日报編者說明：儲安平在这篇發言原稿上特別注明："光明日报总編輯儲安平發言稿""希用原題，原文勿刪"字样）

在4月9日光明日报民盟支部会上的讲話

四月一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有人問我是否有大政方針？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現在行动中，并需以誠意待人，向人学習。需过这几个关：①总編室；②部級；③大家。要一个个談过来不容易，准备由部主任談后再下部里去。工作愈深入愈好。希多监督我，使減少錯誤。

报紙很有前途：比較長，有系統，反映了問題，这种形式是有我們的特点的。人家看"光明"人力最弱，我看弱不在数量。編輯部直接生产的六、七十个人，对旧报紙来說，人却太多了。我們現在在行政上也是'人海战术'，增加了成本，人多則效率不高。凌空講，六、七十人并不太少。質量上說，熟悉党的政策的不少。工作經驗丰富，充分發揮作用。今日的文章（指徐亦安写的"知識分子開'放'之初一文）既有內容又有風趣，情文并茂、雅俗共賞。我們如果尽量發揮主力，則大有可为。

我們联系的主要对象多在北京，都占着特殊优越的地位和条件。我們以后要全面照顧，肯定好的，不足的地方来考虑如何提高。讀者意見有很多是容易做到的，要还几笔賬。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無困难，这是規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罵。我們要估計到这些困难，做得尽力，罵也不怕。

办报就在風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風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民盟有更大的責任。內部团結、了解、溝通，需負起責任来。領导有缺点，也多提意見。

关于改进光明日报工作的几点意見

（1957年5月7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編輯部全体大会上的报告）

从我上月份到报社以后，經曾向同志們請教关于改进工作的問題，在前三周內和九十四位同志交談过，其中二十六位同志是个別談的，有許多同志因受时間限制采取了小組座談方式。在和同志們談話中發現我們全体同志有一个共同地願望：希望我們的报紙在現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报紙今后該怎样办，同志們的意見是比較集中的，就我的印象分岐的意見不大。同志們既希望改进工作，又一致希望在現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因此，我們今天改进工作就有成熟的思想条件。我今天要談的可以說絕大多数是同志們的意見，也可以說我是把同志們的意見整理了一下，当然也参加了一些总編室同志們的意見。一些主要的問題，并向章社長作了彙报和請示，他表示同意。因此，在上周我和各部主任交換了意見。今天向大家报告，請大家多提意見，展开爭鳴，以便把我們的工作改进好。

我今談七个問題。

一、关于怎样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張名符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紙的問題

民主党派很早以前就接受党的領导参加民主革命事業，解放之后，各民主党派参加政治协商会議，各党派都以共同綱領作为循守的政治綱領，并参加了政权工作。經过鎮压反命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各种大的运动，和知識分子教育改造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在党的領导下都作了很多工作。几年以来，我們国家的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知識分子的思想也有了很大进步。去年，党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这个方針对各党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大家感到責任重大更要作好工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中央为了貫徹这

个方針使民主党派充分發揮积極性，指示全党都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民主党派內部的問題由自已独立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报紙在党的領导下，在許多党員同志們的具体帮助下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础。几年以来已經有了很大的成績，这些都使民主党派非常感激。就本报性質来說，从1953年起，就明确成为民主党派的报紙，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我們要更进一步要求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的报紙。上月，中央統战部邀請各民主党派負責人开会宣布了这个方針：以后对光明日报的事全部由民主党派自已独立处理，党不再过問。

关于怎样办好民主党派的报紙，我們完全缺乏經驗。严格說，不仅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紙缺乏經驗，就是民主党派本身的工作也在摸索中。民主党派的作用有兩个方面：一方面要在党的領导下联系、团結、組織一部份社会成員，使他們接受党的領导和教育使他們認真学習馬列主义改造思想，使他們积極参加祖国建設；另外一方面，应該經常向党向政府反映民主党派成員及其所联系群众的意見和合理要求。所以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軌的桥梁，应該同时并进。但是几年来的实际情况是在团結、組織和联系社会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这方面，民主党派作了一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反映民主党派成員群众的意見和他們的要求，作的比較少。这点在三月份民主党派开会时就有人回顧、檢查了民主党派的工作，民主党派的工作有这种缺点，也就是說变为單軌了。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紙的光明日报，恐怕也有同样的情况，在这次交談中同志們反映了这种情況，我們的报紙在言論方面反映民主党派及其群众的要求是比較少，而指导人家、教育人家的口气比較多。这也是單軌而不是双軌。例如去年夏天报导副食品供应紧張的消息，我們的本报訊事实上和新华社的消息沒有区別，北京大学傅鷹教授就有意見他說：“你們的报紙沒有民主党派的味道，你們民主党派的报紙并不能反映人民的意見。”那么，是不是說民主党派的报紙不能或不应該解釋政策和协助政府宣傳解决困难，我認为过去是这样作，今后还应該經常向讀者解釋国家的政策。但是，这个例子說明讀者对民主党派的报紙有不同的要求。

我們的报紙今后应該完成兩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經常宣傳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努力学習馬列主义，积極参加社会主义建設。另一方面要

經常反映民主党派成員及其联系群众的要求。最近，从我們在西安、上海等地召开的座談会看來，大家的意見是很多的，为什么这些意見都一下子冒出來了？当然是听了毛主席講話以后，大家都感动，但是也可以說因为过去要他們講話的机会不多，有人和我談过这样的話：在政协开会时有各种各样的意見，为什么你們事先不报道那些，而等到人家在会上講过了才报道呢？这就說明我們过去的报道是不够的，今后我們一定要發揮上述兩方面的效果。談到这点要順便談一下在和同志們交談中个別同志有这样一种想法：旣然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的报紙，那么就应該办成“反对党”的报紙，这可能是不了解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欧美資本主义制度其性質是有根本的不同，他們是有在朝在野之分，他們的反对党的主要政治目的是要把对方搞掉，取而代之。而我們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型的民主制度，我們的政党沒有反对党，民主党派都是参加政权的，有事大家协商，所以，我們民主党派的报紙当然也不是反对党的报紙，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怎样体現出我們报紙是民主党派的报紙？首先，在报紙上自然而然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报道，关于这点有的同志們有这样的顧慮：民主党派的消息登的多了是不是有人要看，会不会使报紙受到損害。这种顧慮是不是把民主党派消息簡單化了。在三月份，民主党派都在开会，所以都是开会消息，是不是老是如此？据我个人的看法是，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消息不一定都是会議消息，开会消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重要的一部分）。为了使同志們解除这些顧慮，我把初步想到的关于报道民主党派消息，其范圍概括为八个方面談一下。

1、会議新聞民主党派中央会議等。有些会議可能是空洞一些，但是，开会空洞是民主党派的事，不是我們报道的缺点。

2、党派活动的新聞，中央及各地方的党派活动都可以登，也可以包括开会消息，但不完全是开会消息，还有其它活动，如民主党派举办的各种座談会等。估計最初这种新聞質量不会高，但是为了使我报增加民主党派报紙的气氛，使人在思想感情上感到是民主党派的报紙，还是要多登一些党派活动的新聞。

3、关于党派的作用的报导。在这个問題上可以从多方面考虑，如民主党派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起了什么作用，在联系和組織一部分社会羣众中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民革去年联系了兩万多人，其中有些人在社会成員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据一些反映民主党派的工作目前有兩种不同的情况：有人說，中央重視民主党派；地方上不重視，但又有人說，地方上很重視民主党派。陈季子同志在蘭州就看到这种情况。我个人感到民主党派是到处受重視，我認为民主党派的作用問題可以作为我們报紙报道的一个方面。

4、党派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取得的一些經驗。民主党派工作中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但是我們考虑到民主党派的問題政治性比較强，有些問題揭露还不是时候，如民主党派要發展但是沒有干部不能适应这种發展的情况。关于他們的思想教育問題是应該报导的。还有，民主党派工作中有哪些典型經驗，可以作为我們来討論的一个方面。

5、党派生活，主要是小組生活。到現在为止还是一个沒有解决的問題，民主党派的小組生活有些开的比較好，有些开得很不好，大多数是不好不坏。我們可以把好的小組生活的經驗介紹出来，进行交流，帮助改进党派生活。

6、党派成員的活动。由这个問題接触到另外一个問題，在解放以前，报紙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以后一般不登人的新聞了，上报的是得科学奖金的人。我們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一些新人新事，登民主党派成員的活动并不是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蓋京华之类。报道民主党派成員的活动同时又和报道高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員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我們可以訪問一些外地来北京开会的人，可以弥补我們缺乏地方新聞的缺点。此外，还可以訪問到外国去的人請他們談談观感，也可以加强国际主义精神。这項工作采訪面很大。至于各部在采訪工作中的交叉問題，各部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訪。

7、采用民主党派內部刊物中的材料。各民主党派有很多內部刊物，其中有些材料可以采用，例如北京市民革的刊物上曾經刊登过于右任女兒写的一封信，就是好消息，但沒有見报。这項工作是"沙里淘金"。

8、反映民主党派成員同羣众的意見。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們已經

在作，我們要把民主党派成員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所要講的話报道出来。

关于民主党派活动的报导当然不限于以上八条所列范圍，具体的將来由党派統战部的同志补充。我們要求：（一）报道面要广；（二）报道要及时。搞民主党派的东西不在中央，中央是空的，而且各民主党派具体情况也不平衡，所以要下去采訪。

是不是多报道民主党派的活动就能体現我們是民主党派的报紙？我認为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必須在言論方面加强，要从民主党派角度表現出来。就目前情况来說，通过"百家爭鳴、百花齐放"和"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道可以体現出我們是民主党派的报紙。毛主席說过兩大方針是長期的根本的方針。其目的在于团結、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發揮他們的积極性，使我們国家的科学文化更加繁荣！"百家爭鳴，百花齐放"和"長期共存、互相监督"兩大方針的目的是要达到：第一、使知識分子的力量大大發揮；第二、使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人士的积極性大大發揮。我們的报紙既是民主党派的报紙，又以知識分子为服务对象，所以無論就性質或对象来說是应該大力貫徹这兩大方針。毛主席在講話中說大家还有顧虑，要为鳴和放創造条件，那么我們民主党派的报紙就要帮助党創造条件。

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紙：我們在推动百家爭鳴的工作中应該作些什么？我們不仅要用更多的篇幅讓民主党派人士發表言論，而且应該主动联系、和推动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来講話，使我們的报紙变成民主人士的論壇。但是，要推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講話；要更好地体現民主党派的报紙；要鼓励他們大胆放手的爭鳴，首先看我們自己思想上能不能放。否則，很难使版面体現出来。

在討論中，大家覚得形勢發展的快，思想跟不上。我听統战部一位副部長說：毛主席說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請問，大家有沒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沒有眞正拥护和貫徹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查檢一下子。

在討論中：編輯、記者有許多顧虑。記者怕記了不能用，編輯怕出毛病。束手束脚。例如，郑笑楓到西安写信彙报情况，說那里的鳴放未开展，我就給他打了电报，說就此"速發新聞"，結果大起作用，光明

日报起推动开了，那里开了很多座談会。給了他很大的啓發。怕登不出，怕出毛病，習慣了就不能大刀闊斧地直接地搞东西。梁誠瑞是政协的干部，到广东去，我就請他照顧王强华搞新聞，他說那里处处都是材料，可是王强华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顧虑多。今天的形势，是非放不可，而且要大放。芝青同志一再和我說：多走些群众路綫吧，發展的太快了。我也急，昨天打了四个电报，表揚在外边召开座談会的人，給他們打气，鼓励和支持。搞头条新聞，就是工作方向。比如今天見报的头条，就是我叫党派部一定在当天写出来的。时間要争，質量可以少一点，应大大表揚。在中宣部开会时，我就說过，我在思想上是准备挨打屁股的，不希望出大毛病，使人人都滿意就做不成。

这点上章社長表示完全支持我，李維汉部長會对周揚部長說："以后有人要批評儲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这說明領导上希望我們放手搞。我很感激，光明日报改进工作，一定要放手搞。我支持大家放手搞。希望不要束手束脚。

二、关于本报宣傳重点的問題

讀者感到光明日报报道重点不突出，因为我們过去报道方面多头，有：党派、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政法、民族、体育、国际等九个头，自然而然不能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其实，我們的报道有沒有重点？我看是有的，如在高教方面，但是被其它部分冲淡了，从宣傳效果看显得火力弱了。所以，我們認为要更好地把报紙办好，报道重点需要进一步考虑。初步的意見是：（一）民主党派；（二）教育，基本上沒有改变，仍以高教为主；（三）科学，一方面繼續加强自然科学的报道，同时要加强社会科学的报道，什么原因呢？自然科学比較專門，提到具体問題大家不很懂，而社会科学更能够联系讀者。所以，以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要并重；（四）文艺。（五）国际时事，一方面对外代表民主党派表示态度，另外也应該向高級知識分子报道国际时事，向他們进行教育。

报道重点，初步提出五个。此外。关于政法、衛生、音乐、体育等，我們不搞。根据同志們的反映，报道司法工作是为了指导工作，一

般讀者并不要看它，而且司法和其它脫离很远，在版面上不調和。但是，所謂不搞，也不是完全不搞，而是在不同的基础上搞，某件事成为国家大事就要搞了，例如，全国衛生厅局長会議消息就不要搞，再如，节育問題作为人口問題提出就变成政治性的問題就要登。但是，避孕技术就不要登。民族問題也是如此，广西僮族自治区还要搞。体育消息一般不登，国际比賽有教育意义的还是要登。其它，經济方面都是如此，長江大桥、三門峽都要登。以上談的是宣傳重点的初步意見。

三、关于加强新聞报道的問題

关于新聞报道問題，讀者对我們意見很多，社内同志意見也很多。过去，我們报紙長文章多，言論多，时事报道少，就是报道新聞也多是別人談話或座談会紀录等，报道方式單調。有人說，讀我們的报紙要正襟危坐。讀者要求多登新聞。有些同志認为我們报紙新聞少的原因是由于搞問題妨害了搞新聞。搞問題搞久了，甚至看到新聞也不抓，也就是失掉了新聞的敏感。同志們習慣于写大新聞，不願写小新聞，認为搞問題質量高、分量重、火力足，报导全面、系統、深入，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而認为写短新聞不解决問題，也不过癮。还有，年青的同志到报社来就搞問題，是在搞問題中成長起来的，因而不懂得什么是新聞。报紙的新聞要依賴新华社。另外，有的同志反映，有些同志大新聞搞不出，小新聞不願写。也有人說，我們报社从上到下都不重視新聞。有的同志說，报紙版面也限制了新聞。又有人說，稿費制度不合理也限制了写新聞的积極性。因而認为搞新聞和搞問題是兩条路綫。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們今天必須明确，新聞記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写新聞，胡乔木同志在宣傳工作会議上曾談过这个問題。邮局把报紙作为新聞紙类而受优待。旧社会的編輯記者每日必比报：比新聞、比标題、比編排。旧社会报紙重視新聞，采訪的記者如跑一天写不出新聞就回不得"娘家"，几天跑不出新聞要撤职，而我們現在的記者可以半年不写新聞。我認为，我們每位新聞記者都应該是社会活动家，他們应該目光四射深入报道，他們看的要比別人敏銳。記者要有敏感，"新聞遍地是，妙手自得之"。新聞写得好不好，新聞多与少，决定于新聞記者的才能。今后，我們的

新聞絕对不能再有依靠新华社的思想。在我还未来报社之前，章社長曾經約人座談报紙問題，郭沫若院長說：我們的报紙要减少共同新聞（具体指新华社新聞），要增加自己的新聞。

自己搞新聞，开初可能質量低些，但是，我們要培养我們的記者，使他們通过工作成長起来。同时，我們还应該要求快，当天的新聞一定要当天写。作战不能存僥幸心理，要求必胜。当然，新聞有長有短，短新聞五分鐘十分鐘就能写出，記者采訪归途就应打好腹稿。这样，开初可能不習慣，但一定要这样作，才不至影响出报时間。以后，凡是能用新聞方式解决問題的，首先要用新聞表現。至于报道新聞之后要不要再写通訊，应該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再談一下搞問題。我看搞新聞和搞問題事实上是工作方法的問題，如果是工作方法，那末，不仅过去用，現在用，今后还要用。搞問題从什么角度出發，主要为了指导工作。过去在老区交通不便，报紙主要讀者是干部，通过报紙指导工作。解放以后的一个时期也是以指导工作为主，因为有这种需要，报紙应該負担这个任务。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紙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經减少了。所以說搞問題要看从什么角度出發，假定我們从政治角度出發搞問題还是好的。因此，我認为把搞問題作为工作方法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們过去搞問題的缺点是呆板一些。要搞得深入、成熟才能端出来，因而同报紙的性質和要求就有矛盾。另外，搞問題是以分析一个問題为主，这会使报紙陷于單調。我想今后可以把搞新聞和搞問題結合起来，既要深又要快。

作为新聞記者，搞新聞和搞問題是沒有什么矛盾的，一个記者能不能既能搞新聞又能搞問題，在我看来，主要完全决定于人們的思想、習慣和才能。我們不認为"搞問題"和搞新聞"是对立的，我們認为，既然"搞問題"是指采訪工作的从政治的角度和新聞的角度去搞，而不是从改編研究的角度去搞的，所以可以一方面逐步深入，一方面發新聞。当記者集中地在搞某一个問題的时候，在和人們的接触中，遇到有新聞价值的东西，仍然可以随时帶回来，而不必放弃，一条新聞写上二三百字，并不要占去很多的时間，为什么記者一旦搞了問題，就不能再写新

聞呢？反过来說，一个有才能的記者，他对于某一个方面情况熟了，鑽进去了，一面写新聞，一面自然可以發現摸到若干問題，摸到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写出一篇比較有分量有系統的通信来。在旧社会里，也有一些記者只能跑头条新聞而写不出通信的，那些記者大都是能力比較差一些的記者，他的文笔和概括的能力限制他写出綜合的东西，只能一条一条地写，但一般的記者，大都是首先写新聞、同时写通訊的。

四、版面和專刊問題

本报專刊很多。据反映，过去办專刊的原因，是为了通过專刊联系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以專刊作为他們講話的地盤，几年来，專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联系了一部分讀者。同时也說明它是本报的特点之一。但是今天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我們就应該从全面来考虑專刊的問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后，就不必要用这种專刊的方式联系高級知識分子。我們的整个报紙都可以联系。同志們对專刊的看法，有的說它是本报的特点，也有的說是本报的負担。專刊占了整个三版，四分天下有其一，影响了报紙的正常發展。本来办学术性的副刊，在中国的报紙上是有傳統历史的。（如最早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大公报副刊等）但是根据今天本报的具体情况和条件，有沒有可能繼續办这样多的專刊，就需要重新考虑。假如每天出兩張报，那还好办些，可是我們每天只有一張，已經可憐得很，如果繼續讓專刊占下去，勢必使报紙的發展受到妨害。專刊問題，恐怕是同志們多年来深感痛苦的一个問題。因为写了稿要顧虑有沒有地位，能不能刊出。專刊当然有它的讀者，但从整个报紙說，畢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对專刊应該采取新的处理办法，大家的意見比較集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主張去掉大多数專刊，少数的可以保留，还有个别同志主張全部取消的。根据同志們的意見，保留"文学遺产"、"史学"、"哲学"这三个專刊。我們接受了同志們的意見，决定这样做。上星期已停了"民族生活"、"文艺生活"兩个。"政法"、"科学"、"文字改革"也已經同意从六月份起停刊。

留下的專刊今后怎么处理呢？我們的理想是使报紙有四版正常的东

西，基本上不使專刊占用三版。"哲学"、"文学遗产"是周刊，星期天加半張紙，使它們并在一天出。"史学"是兩星期一次，还讓它占三版，一个月只占兩天。但是这样安排，要牵涉到紙張供应的問題，还得进一步研究。專刊問題是多年来沒有解决的問題，这次我們下决心解决。决停办的專刊，其中有一部分材料，可以作为新聞的，就按新聞来报道，可以作为文章的，就按文章来处理。如科学、文字改革的一部分东西，还是可以見报的。过去联系的科学家，还要繼續联系。

2、今后每天的四个版面，怎么支配？提出初步的意見，請討論。

先从后面說起，現在第四版是国际时事。我报在国际时事方面有兩个任务：在国际上代表民主党派就国际問題發言；在国內向讀者报导国际时事，通过国际时事的报导向讀者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关于前一点，过去除了写社論以外，还用"本报国际評論員"等方式对国际問題發言，以后仍然可以繼續这样做，关于后面一点，过去在工作中發生的困难比較多，主要是因为：北京讀本报的讀者一般同时也讀人民日报，讀了人民日报的国际版以后（他們有兩版）就不一定再要讀我报的国际版；外地的讀者，情形也一样，因为我报到外地，有关当天的国际时事，讀者早已看过当地的报紙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国际部决定以后国际版的稿子，五分之二用新华社的新聞，五分之三用自稿（包括本报特約的外稿）这个办法是比較好的。目前的問題是如何再提高一些。新华社的新聞稿外，还可以考虑有批判地引用一些其他外国通信社的新聞稿，使我們的讀者能够从更多的方面和更广泛的角度上来了解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那五分之三部分，也应該考虑到我报的主要讀者对象是高級知識分子，可不可适当地有区别地編譯一些分析国际政局动向的外稿，而减少那种把某些沒有見报的新聞綜合一下，再加上若干历史資料而写成一篇知識性或資料性的文章的做法？关于国际版的版面，我們就整个报导的篇幅通盘考虑，建議以后占三分之二版。我們認为关于本报的国际时事报导，不是增加量的問題，而是提高質的問題，假如能使这一版上的文字大家要看，这样，在形式上虽减少了，而在实質上是加强了。

四版下面的三分之一是文艺版，同志們在討論中都贊成繼續搞文艺，怎么搞？过去文艺方面报道方針不明确，表現在版面上，沒有給人一种

显明深刻的印象。所以文艺报道的方向要重新明确一下。以后怎么搞，现在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只提出三点方案：

1、給文艺部以固定的版面。过去报道的面广、內容多，在形式上不集中，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非常分散。版面固定后，就有了具体的努目力标，可以更好地推动工作的开展，提高同志們的工作积極性。

2、以报道文艺动态为主。因为搞文艺理論的东西，根据我們的人力和其他条件，怎么也搞不过"文艺报"去。与其搞不徹底，就索性不搞它。

3、版面編排艺术上，要求达到最理想的地步。要非常的生动活潑，美丽。这就需要多登短小精練的細致的东西。要有消息，有漫画，有插图。要求每次登八条消息，至少亦得有五条。文艺部的同志們表示接受这个意見，很好。

第三版：学校教育部和科学部的东西登这一版，主要报道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是否还可以考虑一个固定的"欄"，專門报道学术动态。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很需要知道学术研究方面的新問題、新論点，也需要介紹。科学技术"欄"的新發現、新創造，大都通过一些学术性比較高的出版物来反映，我們对这些学报的材料，不作新聞处理，还作为綜合报道处理，放在固定"欄"更需要多搞一些这类的东西了。現在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和各大学，都出版各种学报，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把这些学报看到了。我們就可以考虑作一些綜合介紹。引起他們的兴趣。这样搞的目的，是使高級知識分子能比較方便地及时知道国內外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东西。如果报道的水平适当的話，是可以受到讀者欢迎的。

除教育、科学、学术动态以外，，凡是学术性的論文，也都登第三版。

第二版：各民主党派的报道都放二版；这点已很明确。政論文章也登二版。

第一版：要聞。社論和民主党派、教育、科学、国內外的重大事件，应該登一版的，都登一版。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新聞也应登在一版。

由于考虑到民主党派的消息有一部分必須登在一版，而某些国內新

聞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改登二版，也又就是說，將来一版二版在稿子上發生交叉的情况一定非常多，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决定一二兩版由要聞部和党派部兩部会同合編，这兩版相通，比較机动。

五、关于編排式样和編排風格問題

具体的办法还沒有，只能作为一个問題提出来。但是这个問題必須解决。我們并不是完全从形式上来考虑的。我們知道报紙的生命力量在于它的內容。但是編排艺术如果高一些的話，对內容的效果就可以有所提高。去年"人民日报"改版是一变，"文匯报"出版又是一变。毛主席講話以后，社会的气氛为之大变。新聞界的百花已經在开放。我們打开报紙来看，大家是想变，即使小也要，总是在变。形成一种竞賽。这是好現象。我們怎能正襟危坐呢？必須在适当的情况下参加竞賽。把我們的报紙办好。

潘文彬同志来信說，中南一个老教授，就对我报的編排形式很有意見。他說："光明日报"太呆板、太守旧。我們必須面对这样的現实，發揮大家的潜力，来改进版面。不必逃避現实。文匯报在知識分子当中能有較深的印象，就是因为他們善变，也正說明"教条主义之不得人心久矣"。（一位新聞界知名人士的話）文匯报新聞多、編排形式新穎、活潑，在旧社会来說，是毫不足奇的。但是今天，对我們来說，就很有值得学習之处。我們要学習他們：

1、对新聞的敏感·

2、时間性抓得紧；

3、采訪新聞的活潑精神。

4、有自己独家新聞的特点。

他們不甘心采用新华社的新聞。可以看出，他們是在經常地想讀者需要什么的問題。很大胆地去搞。我們学習别人好的地方，并不等于跟别人跑，而是要吸收他們的長处，加以溶化，創造出自已的东西。我們也有我們的長处，比如文章長，分量重，有一定的深度，能解决問題，适合高級知識分子讀者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就比文匯报强。但是我們不能以此为滿足。我們旣要深，又要快；又要分量重，又要有風趣；旣

有学术味，也有人情味。要創造自己的風格，不能跟在人家后面跑。比如标題直題，就是文匯报的一个創造。作为一个例子来說，人家能創造，我們为什么就不能創造，这是可以研究的。至于風格怎么样才算好，是很难說的，可以意会，不能言傳。現在我們决定由黃卓明、熊劍英兩位同志，負責研究改变本报版面編排風格的方案（当然不是由他們包办）。突破成規，創造新的东西。

关于文風。主要是長。工作报告，工作总結式的味道很濃厚。这也許是受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影响吧。总是社論首先指出，……社論指出，……社論接着指出……或是×××說，×××最后說。缺乏人情味，使人看了討厭。这种报道方式，必須受到排斥。最近徐亦安同志写的"知識分子開放之初"和潘文彬同志写的"关于六經注我的談話"，就很好，很吸引人，內行外行都喜欢看，受到高級知識分子的好評。有些过去不訂光明日报的高級知識分子，看了这兩篇东西之后，也說，以后非訂一份光明日报不可，可見我們內部是有写文章的好手的。

对美术組的工作，同志們很有意見，希望改进。在原則上，美术工作必須为版面服务（搞創作最好不占工作时間），但要結合我們报紙讀者对象的特点来进行。比如多搞些書法、国画之类的有中国味的东西。总比那些不三不四的美术体要好的多。美化版面的工作，能做到使高級知識分子欣賞就成功，討厭就失敗。

六 关于組織机構問題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問題。目前还沒有一个机关可以說它的組織机構是最完美的。因为这是需要在实际运用中来改进的。我們这方面比較严重的缺点是：

1、各事業部和編輯室有矛盾。表現在各部的稿件都要送編輯室，但事前編輯室并不了解各部的發稿情况，这种隔膜現象，使編輯室的工作很被动，形成来什么就用什么。其次，在体制上，編輯室和各部是平行的，他們的發言权就有一定的限度。从理論上講，对于一些質量不好的稿件，可以打回去，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当然可以到总編室打官司，那样往返周轉，会影响出版时間。何况并不能天天篇篇都打官司。各部

的稿子在部內經过兩道手之后，發到編輯室还有專人再看一次。說它好，是經过三道关口，可能少出点錯，說它不好，是重复浪費。再就是各个部沒有責任感，有稿缺稿，編好編坏，它們都可以不管。同时，編輯室限于力量，在工作中有一定的限度，对各部稿件，在版面安排上不够周到时，各部又很不同意。

2、各專業部和国內政治部有矛盾。过去就發生过同时派几个記者到同一地方去采訪的重复交叉現象。如有一次在四个記者一齐到广州去采訪。这合理嗎？在北京，各部也有分工不明确的現象。这主要是方針任务上的問題。

3、各專業部和讀者来信部有矛盾。讀者来信部的同志們反映，他們不能單独作战。在处理一些来信时，如果事先不和專業部取得連系的話，很有可能把問題搞錯。有的时候，讀者来信部搞某些东西，还会打乱專業部的工作計划。同时，讀者中高級知識分子很少給我們来信。另外，是每个人的工作是很少，潛力得不到發揮。也是一个主要的問題。

現在的組織机構，最大的优点是能充分發揮独立作戰的积極性，有計划地發表言論，对問題的掌握比較系統清楚。該怎么办？有的同志建議仍旧恢复到原来的編輯、采訪、研究三个部的形式。可是那样作，势必要把現有机構根本打乱，各个工作环节和人事的安排，都要作很大的变动，重新来过。对目前工作也会有影响。經过考虑，覺得，我們固然需要大刀闊斧地进行改革，但还必須穩扎穩打，也就是說，沒有把握的事，我們就不做。对編、采、研三部的好处，現在还不能做結論，所以暫时不动，今后有必要的时候再改。現在决定：

1、撤銷編輯室。改变过去人力受限制和不接头的情况。各个版由各部分別包干負責。国际部和文艺部編第四版。学校教育部和科学部編第三版，这样搞，各个部对他們所發新聞的来龙去脉，心中有数，就能很恰当地处理。同时也可提高他們編好报紙的責任感。各版互相之間还可以展开竞賽。

上星期六部主任会上提到：过去的版面是由編輯室統一集中搞。以后分到各部，各版不問怎么連系，由誰来統籌，今后各版之間，还是要互相連系，互相商量，組版时仍然集中在一个屋子里。把过去的优点保

留下來。关于杭籌安排的問題，由总編室負責。

撤銷国内政治部。

撤銷讀者来信部。接受讀者来信部的同志的意見撤銷，改为讀者服务組，具体的工作这样安排（1）登記卡片的工作仍做。（2）来信的服务性的工作仍做。（3）有关事業的来信分送各有关部处理。意見，成立一个讀者服务处。

七、关于工作时間問題

目前，我們社的工作时間机关化，我們考虑到要报館化，主要是下午和晚上，一部分同志要下午和晚上工作。既要照顧工作，也要照顧生活在晚上工作的同志，希望工作同志絕大多数在晚十点鐘左右作完工作，只有少数人留下来工作到最后。深夜里工作的同志报社应派車送回家。

此外，还有一些問題沒有解决。如到外边的記者由誰来派，是各部还是总編室，新聞少的問題，今后应怎么搞問題，改革后是否有保証的問題，还未作深入的考虑。好在我們并不想一次就解决所有的問題，需要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發，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光明日报編者說明：这个講話是根据当时的原記录整理的）

6月6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邀开的各民主党派搞宣傳工作的同志座談会上的講話

我个人到报社时間不多，了解的也不够。在今天新形势下，中共中央統战部明确光明日报交由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使更能体現民主党派报紙的特点。过去这張报紙本身如何爭取民主党派的領导也不够，报社房子問題沒解决，机器沒解决，人力也沒有解决，厂房也不理想。現在思想上大家明确了，但在業务上还很不够，我們希望报紙改进，但要眞正扭轉过来，却須要一个过程。

这次在改进工作中，首先要如何体現是民主党派的报紙。我們說，民主党派作用有兩方面：一方面，作为党的助手，要起推动、教育、改造成員的作用，另方面，代表成員及所联系的群众的要求和意見。总的来說，民主党派在推动成員加强思想改造方面做的比較好一些，而代表成員反映意見、要求做的是不多的。在今天报紙要更好地报导民主党派的要求和消息。同时，也存在有顧虑，認为民主党派仅仅是会議消息，我說，会議消息只是一部分，民主党派消息有很多面，初步想到：1、会議（指中央）2、民主党派活动（包括各地）从地方組織对报紙的感情角度出發。3、民主党派作用問題，4、民主党派本身存在的問題，5、民主党派生活，6、民主派党成員活动，7、利用民主党派內部刊物，8、广泛反映民主党派的意見。以上初步想到这些，說明民主党派报导面是广的，作为努力的方向要求：广、深。

重要的关鍵，要改变过去光明日报的沉悶所謂"文風"，理想用軟一些的笔法来写，跳出現在的圈圈。

报館內部也有一些改革，一个是要求多写新聞，本来写新聞是不应該有問題的，但在光明日报上却很突出，过去同志們不習慣搞新聞；而習慣搞問題，这是占統治地位的作法。我們应向文匯报学習敏感、灵活。同时版面也想有所改进，过去是比較呆板、沉悶，但是今后是否能面目一新，还有待努力。另外是專刊，过去專刊占很大篇幅，这是光明日报

多年来要解决而未解决的問題，現在是將第三版基本上解脫出来，仅留史学、哲学、文学遺产。一版、二版要聞与民主党派，三版教育、科学，四版国际、文艺。

我一到报社，首先提出要注意各民主党派平衡問題，另外，光明日报代表民主党派报紙要詳尽。人民日报人多版面多。我們由于版面拥挤，因而引起一些誤解。

（最后儲安平又說：）

总的方針沒有变，在具体作法，業务上有所改动。

1、編輯方針，几年来一貫是除民主党派以外，以高教、科学为主。

2、关于社論的問題：就現在情况来看写社論是比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論，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穩；再一种是說共产党的好話，歌功頌德。批評监督的社論沒有，要写批評监督的社論，必須社务委員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員，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須社委会受权。在沒有受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3、銷路問題，在一个相当时期才能提高發行数字，現在我們注意充实內容，大家愛看，自然会增加数字。

关于召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座談会的意見

（光明日报編者說明：这是儲安平亲自拟定的在十一个大城市点火的方案，打印后交由赴各地点火記者随身携帶并分發給参加座談会的人。）

座談会用光明日报名义召开，5月間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蘭州、沈陽、長春、青島等大城市分別举行。兹說明各点如下：

（1）目的和要求：①集中反映各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見，对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意見和要求。②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發，通过对某些典型問題，或典型事件的揭發和討論，提出各地对解决当前存在着的各种主要矛盾的意見。③希望参加座談的同志根据"放"的精神，徹底敞开，暢所欲言地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和建議。

（2）邀請对象：請当地各党派組織負責人和当地学术界中心人物提供名單，綜合研究后再和有关方面商量确定。

邀請对象应尽可能包括各民主党派、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等各个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

邀請人数不要过多，一般以十人上下为原則。如过多，或者使發言人由于时間的限制不能暢所欲言，或者由于內容太多而使本报沒有足够的版面刊載，因之，在考慮邀請对象时，应先适当地估計被邀請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見較多以及是否勇于發言。

（3）座談会題目：徵求当地各党派負責人和当地学术界中心人物的意見，根据总的要求，結合当地特点和特殊問題提出座談題目。

（4）会前联系：①向协助召开座談会的有关方面充分說明本报召开座談会的意圖，并且征求他們对如何开好座談会的意見。②会前訪問所有邀請参加座談的对象，向他們說明本报的意圖，說明本报在各大城市布置座談会的計划，請他們准备尽量敞开發表意見。并要求發言越具

体越好。

（5）报道方法：①座談会举行后，当天將座談会情况以及座談中所提出的突出的問題摘要發新聞电，准备在一版头条地位發表。②在会前訪問中或在当地其他各种活动中，应密切注意抓新聞，随时發电报道。③每一座談会發言紀录整理后用最迅速办法寄回报社，全文發表（一律以發言先后为序）。④整理發言紀录全文时請加按語；說明开会时間，地点，討論的問題，參加者的姓名、党派身份（如某某民主党派中央委員等）和工作崗位的职衔。發新聞电时亦須注明發言人的姓名、党派身份和职衔。

（6）其他：①座談会內外对本报工作的意見必須詳細紀录，寄回报社作改进工作的參考。②座談会主持人在开会时除說明召开座談会的目的、要求和討論題目之外，还請說明本报的性質（各民主党派报紙）和本报現正进行改革的簡單情况。

用个人名义組的写稿信

多时不見，您好

我在今年四月入光明日报担任总編輯的职务。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紙，它以民主党派和文教科学为报导的重点，它的主要讀者对象是高級知識分子。光明日报的条件比較差，人力比較弱。要把这張报紙办好，要化很大的力气，并且需要一个过程。我写这封信，就是請求您給我們指导和支持。

我們努力的目标之一是使光明日报能够成为民主党派成員和高級知識分子的一个論壇。为了更好地响应并貫徹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监督"兩大方針，我們誠恳地欢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报来陈述您对于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見。在一般情况下，我們不預出題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話，写自己願意写的問題。假如能結合互相监督的方針發言，更好。我們希望文章不要太專門；在光明日报目前的条件下（每天只出一張）还不可能登載純粹学理性質的文章。报紙暫时不能加張，版面較挤，因而希望文章也不要太長，最好在三千字左右。

我們热烈地希望您給我們更多的帮助。我們收到文稿后，决不积压；但因积稿过多或新聞过挤，不能很快地登出来的話，还請原諒。

最后，我向您道歉：用这样一种印刷的信件約稿，不仅缺乏人情，而且是不礼貌的。只因解放以后，我和很多朋友都中断了联系，这次要写的信太多，因而不得不把这封信印出来，借以节省一部分时間，虽然这封信的信封、信稿、名字都是我恭敬地亲自写的，但我仍然应該向您表示歉意。

此致

敬礼　　　　　　　　　　　　　　　　　　　　　　　　儲安平　月　日

二、揭發材料

高天同志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員会上揭發儲安平的反动言行

（1957年6月15日）

一、实际工作情况

儲总編輯四月一日到社工作，头三个星期是找編輯部的同志們談話、开会，向大家談他的办报主張，也要大家談意見。四月中旬，人民代表政协委員开始視察，他就自已布置报道工作。四月十八日布置了駐上海記者的工作。五月七日他向編輯部全体工作人員作了改革报紙的报告。五一，五四社論經他审閱，此后即看稿件的校样和二三版大样。分头直接布置各部的工作。一个月前，前总編輯常芝青同志就离开工作。副总編輯高丽生同志每星期代我上一兩天夜班（夜班主要是管新华社稿和一四版組版工作）。这期間編輯部各項工作，儲都沒有找高丽生談过。

儲总編輯原决定六月十日改版，九日他就不来工作了。

以上是儲总編輯管实际工作的簡單情况。他不是在改版前就沒有管实际工作。

二、办报方針

儲总編輯說过去光明日报長期死气沉沉。他說要向文匯报学習。

他說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要創造条件主动的組織推动他們对共产党發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他在布置要聞部工作时，要求搞人民生活（物价等）問題的报道，要主动去發掘，体現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講話。

他否定报紙指导工作的作用，反对报紙宣傳政策。認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說：报紙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紙要登消息，党

和政府不許登。报紙"代表群众"，党和政府同报紙在这点上有矛盾。他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

他說，"光明日报讓民主党派独立自主的办，这句話說的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做手势）。"他說·"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風浪，担一担斤兩。""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在这里，他对我举了几件事，大概是所謂"暗礁"。（1）青島座談会。电訊上說这个会談得最多的是肃反問題，里面写了肃反的具体問題。常芝青同志曾向他提出过，肃反的具体問題不能报道。我指出青島座談会的报道不好，肃反具体問題不能报道。他不同意，但說，你要删可以删。（2）北大学生民主牆的报道，他亲自布置决定要登。我提了意見，認为整風有領导有步驟，学生鳴放現在不能报道，發表了影响全国，造成困难。他不接受，决定登了。登出后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报社內外都有很多意見。他还說，文匯报的报道比我們的生动，深刻、有感情。（3）北京各大学学生鳴放的报道。他亲自指揮記者采訪，一定要發表。我兩次郑重提出不同意見。我說，北大消息已很不好，各大学报道，在中央报紙登出来，就是向全国宣傳，推动学生鳴放，这样就要在各地造成混乱，对整風，对国家不利。他不理会。他說："这件事你看得这么严重，我就沒放在心上。是事实我就要發表。"我向他反复說明，整風是有領导有步驟的，請他考虑有利不利的問題。他对我說："教条主义就是这样的，陈其通就是这样的！"

他說，在这个問題上，我們民主党派报紙就要和人民日报不同。我說：在根本立場、社会主义利益上是共同的，做法可以有所不同，整風有領导有步驟，这就是共同的。他不同意这个意見。

过兩天他还向学校教育部催这稿子，学校教育部的負責同志說时过境迁，不要發了。这才沒有發出。

在談上面这些問題时，他說，要考驗考驗，不知是考驗共产党还是考驗他肩上担多少斤兩。

有人对他說，重大問題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联系，他說，我們是民主党派报紙，用不着。但在我們登錯了消息的时候，他要我向中宣部打招呼，不叫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指出我們錯誤的消息。

他說民主党派的报紙应該是"双轨"的，过去"教育"太多了，"代表"太少了，这样不行。有位同志在評报欄就这問題向他提出意見，問他要把光明日报帶到那里去？他对我說，这是方針問題，是領导上决定的事，不应在那里討論。他向徐亦安同志說，这意見对他是支持还是打击？

报社同志們要問：他的"方針"是領导上怎样决定的？

有同志建議在內部刊物上討論怎样才是民主党派报紙的問題，他不同意。

这些就是他对办报方針的主張，从这可以看到，光明日报的資产阶級政治方向是怎样来的。

三、言論方針問題

他說，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論，一种是教条主义的，一种是說共产党好話，歌功頌德的。要眞正"代表"發言，那么，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各党派中委几百个，有几百个婆婆，用个人署名可以，用社論就不行。他在民主党派实职干部座談会上这样說。他又說，因此，对社論不要存多大希望，以后只会少不会多。

难道各民主党派就沒有共同的立場、共同的利益嗎？

我們曾兩次建議写"六一"和团代大会的社論，"六一"的社論他不同意写，說不要教条主义的社論。团代大会的社論勉强允許写了，后来說是写的不好，沒有用。

他曾几次对我說，罗隆基推荐陈新桂来报社工作，罗說陈新桂在民盟理論是最高的。儲安平打算找陈来主持評論工作，陈新桂的荒謬絕倫反动"理論"已經暴露了。他和儲安平的"党天下"謬論是如此合拍的。陈新桂如来工作，那么，光明日报就更加徹底的成为右派的政治工具了。从儲安平对社論的看法到罗隆基推荐陈新桂，右派分子劫夺光明日报的野心难道还不够明白嗎？

四、国际新聞

国际报道，他要求直接用外电，多登外論，多登社会党的消息，少登兄弟国家共产党的消息。

这究竟是我們的国际宣傳，还是給資本主义国家宣傳？

后来，中宣部决定各报一律不得直接用外电的时事新聞。他說，这張王牌打不出去了。

五、帮助共产党整風的宣傳

他說，我們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問題，是共产党的事。

在这种主張的指导下，在九个城市举行了座談会。他在布置时說，要照顧各党派平衡。首先要找意見多又敢說話的人，然后考虑代表性。

西安座談会根据这要求，找的大都是运动中被斗的人，整个气氛很不对头，說得一团漆黑。我向他提，这样搞不行，应提醒在蘭州的記者不要这样搞。他不同意，要回来总結时再談。

在几个地方去組織座談的同志發回消息后，他立即普遍去电鼓励，要他們“放手作去”。九城市座談，都是全版登載，發了十几万字。

这样，外界对本报座談会的反映是：到处点火。从西安、蘭州組織座談会回来的同志在总結会上提出，我們这样做，是不是偏听偏登，只登一面之詞。他不理会。

在內外不滿意見紛紛提出之后，他还布置了技术人員的四个座談会。

他曾几次提出要开中小学的座談会，我和学校教育部都提出不同意見，才沒有搞。

前面說过，他要报道学生鳴放，我們和他爭，他非常不滿。

他听到清华大学要座談党委制問題，要党派部立即报道关于党委制可以取消的消息，不管有沒有确实的消息来源。以后，与此有关的消息他特別有兴趣。發錯了也不承認。

文章，他是有所选擇的。千家駒的發言登全文，他不滿意。李俊龙主張拆牆从兩面拆的文章和邓初民的文章，他說沒有什么新意見，登了不好。李俊龙的稿子因为是記者約的，他提出以后記者約稿的办法要考虑，要通过总編室。接着就决定文章要他看了再發排。張友鸞宣傳資产阶級新聞观点的文章，也是記者約的，他完全沒意見，亲自刪改了發表。

我們自己有美术組，他特別直接約了漫画作者，專門画政治諷刺漫画，要求每天画一張，提出的主題是那些整風中揭露的現象。

五月下旬有兩天，座談会少了，登了几篇教育、科学的稿子，他就对我說，这几天我們松了。

他不止一次說，我們鳴放报道跑到人民日报前面了。

現在很清楚，光明日报那时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說：我的發言和我在报社的工作要分开，不能混在一起。

同志們在評报欄提意見就指出，他的發言和他办报的立場是一致的。他使光明日报在这期間离开了社会主义軌道！

关于报紙的方針問題，他来了之后，这样說，这样做了。常芝青同志和我們曾不止一次建議他要求召开社委会討論，都沒有結果。他說，他的做法是社長同意的。

我們要問，他这一套按照資产阶級政治方向办报的方針和做法，社長是不是同意了？社長給他的指示是些什么，报紙办成这样，还不召开社委会，是些什么打算？

人民日报批評，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間內走上了資产阶級政治方向。本报办了八年，同志們工作了八年，是社会主义报紙，大家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段时間报紙被帶到資产阶級政治方向上去了。同志們心情非常沉痛，要求社委会把这个严重問題，徹底檢査，明确責任，向全国人民作出交代。

張友同志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員会上揭發儲安平的反动言行

（1957年6月15日）

社長、各位委員：

今天編輯部的同志們来列席社务委員会是有話想講的。昨天人民日报批評本报，在最近一个时期內走上了資产阶級的政治方向；我認为这个批評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光明日报在最近一个时期，的的确确成

为資产阶級右派野心分子的工具，在讀者中間，在編輯部內部，在报社全体职工中間，已經有不少人提出批評，表示憤慨。作为报紙一个工作人員来說，我們在檢查这个問題的时候，我們的心情不能不是很沉痛的，因为我們同志們的辛勤劳动为右派分子利用，而由此造成的本报在政治上的重大损失，是無法挽回的。

是什么人使光明日报走上資产阶級的政治方向呢？从編輯部的角度来講，我認为直接的負責人就是总編輯儲安平。儲安平的办报方向，就是資产阶級的方向。儲安平到报社的第二天同我們一次談話中，后来在国內政治部的会議上，他都談到：解放以后报紙的一套做法現在不够用了，有些过时了，現在我們要向中国过去的旧报学習，要用旧的方法才能团結旧的知識分子。他对于編輯部有些在旧报工作过的同志，很感兴趣，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过低的估計了这些同志的进步，在解放以后七八年的工作实踐中，他們的观点早已改变了。儲安平同志解放以前曾办过观察杂志，他是不是用办旧观察的方法来办光明日报呢？

儲安平同志也不贊成报紙是可以而且应該指导工作的，他曾說“报紙就是报紙，报紙过去就叫新聞紙，它就是报道消息的。”不管这些消息报道出去对人民有利無利，是消息他就主張报道。他曾同我們說过，現在办报最大的矛盾就是代表政府呢还是代表人民？因为有些消息政府政策不准登，而政府叫报紙登的东西，据說讀者不喜欢。我們認为政府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基本利益是一致的，矛盾是有的，但这是內部矛盾，并不是不可調和的。儲安平同志这种絕对对立的观点，就不能不使他走上錯誤的方向！

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紙，这是从来就很明确的。光明日报怎样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的报紙呢？儲安平同志說，应該是双軌制，就是說要由上而下教育民主党派成員，又要由下而上的代表民主党派成員的利益，讓他們在报紙上講話，成为他們的論壇。这个說法当然是对的，問題仍然是發生在把兩者絕对分开的孤立片面的看法。他說光明日报过去是教育多，代表少，今后他要多代表，少教育。請問，教育民主党派的成員是否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而代表他們講話，是否也有教育的作用？在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論發表之后，編輯部的同志向

儲安平同志提出質問：盧郁文接到恐吓信的事件，光明日报为什么不代表他講話，在鳴放中出現了大量的离开社会主义的錯誤言論，光明日报为什么不代表民主党派表示态度？可以看出，儲安平說的少教育多代表，实际上就是代表什么？

光明日报这一个时期社論很少，五月份只有六篇，兩篇是紀念五一和五四，四篇是政治时事方面的。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風，是这一个月的报紙最突出的中心，但是，沒有發表一篇社論或者短論来闡述应該用什么态度来帮助共产党整風。这使人很奇怪，一个办过报的人不能不知道社論的重要作用，但是沒有写。在評报欄上，有同志提出社論太少。我同他在一次个別交談中，也建議总編室应該制定一个社論計划，但是他不接受。他說社論不好写，說共产党的好話，已經說的很多了，不必再說了；写四平八稳表示态度的东西，是教条主义，沒有人要看的。唯一可以写的是体現对共产党批評監督的东西，而在这一方面呢，鳴放中已經提的很多，这些問題还沒有結論，各个民主党派之間意見不一致，一个党派之內意見也不一致，因此很难写。他說，現在只有个人說話比較好說，代表各党派的社論难写。实际情况如何呢？各个党派之間，一个党派之內，难道就沒有一致的共同的东西嗎？难道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大家共同的基础嗎？在他这种思想领导下，庆祝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社論，就被他否决了。而就是在这一次会議上，毛主席提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論行动是完全錯誤的"指示。

以上是說的他的思想观点。在这种思想观点的指导下，儲安平采取了什么具体方針呢？他的方針就是揭露，揭露，再揭露，揭露的越多越好，越尖銳越好。他曾說："我們的目的就是揭露，分析改进是共产党的事情。"在他亲自主持下，專門派了四路人馬，在华东、中南、东北、西北的八大城市，用編輯部名义召开鳴放座談会（原打算西南也要去，后因派不出人作罷，而在青島因派記者去有別的任务，捎帶着还开了一次，共为九次）。

儲安平同志对召开这些座談会，有兩条原則指示，第一是邀請参加的人应有代表性，第二更重要的，应請那些对党有意見而又敢于大胆講的人。前面講过，儲安平同志是主張多搞新聞，少搞問題的，这些座談

会的材料若是用处理新聞的方法来处理，是可以加以取舍选择的，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为了揭露，这些座談会的發言是全文刊登的，而且不管發言人講的某些事实是否实际，只要他說，他們就記，記了就登。有聞必录。記者变成記录員。九次座談会共有十余万字，全是整版整版刊用的，使消極的东西在版面上超过积極的东西，給人看来，到处漆黑。編輯部有同志批評这种做法是到处点火，我是同意这个批評的。因为在組織这些座談会的时候，并沒有考虑到地方上的情况，可能使一些城市的整風处于被动地位。外埠座談会开完之后，儲安平同志曾經想总結經驗，并且認为这种做法很主动，应該是肯定的。一位曾經直接組織过座談会的同志（民建成員），完成任务以后，向儲安平同志提出意見說，我們現在批評共产党偏听偏信，可是我們自己是不是偏听偏登呢？他說据他在蘭州了解的情况，發言人所講的某些事例与事实是有出入的，可是我們还是原样發表，这样做好不好呢？儲安平同志看来并沒有考虑这个意見，因为在这之后，儲安平还指示在北京科学技术界举行了四次座談会。（發表的方式改变了）

社会主义学院，有一个人叫張軫，曾經在体委工作过，他在鳴放中指名批評了周总理、賀副总理。在發稿时，我們想請儲安平同志考虑一下。据我們看，第一对政府最高負責人公开批評是否有不好的影响，第二，批評者的观点与所举事实是否完全符合事实？因此可以考虑不必指名登报。但是几次請示，儲安平只同意把周总理的名字去掉，坚持要把賀副总理指名見报。最后并且表示登出去考驗考驗吧！考驗誰呢？儲安平要考驗共产党。

發表北大民主牆的新聞，我們也提出过意見。学校搞民主牆、辯論会，我們認为这有些大民主的做法，不应該提倡。尤其是这种帶有群众性，煽动性的新聞，發表出去是会产生不良的后果的。直到現在，我們看到的，全国报紙当中發表这类消息的只有光明、文匯兩家，北京的其他各报一律都未發表。在儲安平指示一定要登的情况下，我們教育部主任亲自动笔，尽量想把民主牆的报道写的健康些，标題也設法正面誘导，但是，这条消息的發表，根据我們收到的反应，仍然是有坏作用的。可是，这样做，儲安平并不滿足，見报后，他說沒有文匯报写的生

动有感情，而且他継續指示要把北京好几个著名的大学的民主牆都要报道。后来我們同教育部主任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才設法沒有継續發表！

儲安平同志在知識分子中有不少朋友，利用社会关系給报紙組稿，这完全是对的，但是，儲安平發出100多封組稿信，全是要求作者在批評监督的原则下，暢所欲言，也就是希望作者写揭露性的文章。

从以上所举儲安平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从报紙这一个时期的內容来看，說光明日报走上了資产阶級的方向，是符合事实的。这确实不是偏向，而是方向，不是在正确道路上發生的偏差，而是向着一个危險的錯誤的方向前进，按照儲安平的本意，他不是要把光明日报办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报紙，而是要办成資产阶級反对派的报紙，所幸的这个方向性的錯誤，已經被群众揭露出来，并且加以制止了。这也証明这个錯誤的方向是走不通的，是社內社外广大讀者及全国人民所絕对不允許的。

另外，儲安平同志在統战部的發言用了光明日报总編輯的名义，对报紙在政治上的損失很大，編輯部同志們对此意見很多，我就不多談了。

光明日报社民盟支部大会揭發儲安平的反动言行

本报訊 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支部昨天举行支部大会，討論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風，以及如何对待錯誤言論的問題。会上，大家一致批判了該报总編輯儲安平的反党言論，表示要和他在思想上划清界限。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員吳晗、秘書長关世雄出席了这次支部大会，光明日报部分盟外的編輯和記者也应邀参加了会；他們都在会上講了話。

張蔭槐說，儲安平的說法是要取消党的領导

很多編輯和記者对儲安平在中共中央統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的發言提出了批評。張蔭槐說，儲安平說："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

最終根源。这种說法是要取消党的領导，是对党的污蔑，是想挑撥党群关系。"党天下"是不符合事实的，儲安平自己就是全国人民代表，他自己沒有參予国事嗎？張蔭槐表示要和儲安平划清界限，要求光明日报向讀者表明自己的态度。

熊劍英說，儲安平說"大家拥护党，但并沒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說拥护党和国家主人之間有矛盾嗎？正因为是主人，才拥护党。

張西洛列举事实，說明儲安平的發言是經过深思熟虑的

有人提出，儲安平的發言是否由于缺乏愼重的考虑，感情偏激，或是措辞不当而使人誤解了他的本意。張西洛的發言否定了这种看法，他說："中共中央統战部的座談会，我是参加了采訪的，我和八十多位發言人都有过接触，沒有一个人發言像儲安平那样愼重。儲安平的發言事前有講稿，并且复写数份，还要求不許刪改題目和內容，文后写有'光明日报总編輯儲安平發言稿'。講稿上字句有修改，可見是非常愼重的。儲安平發言以后，把講稿交給我分發給各單位的記者，并且說先給文滙报，以便往上海發电报。"

会上，很多人对儲安平在光明日报社的言行提出了批評。謝公望說："儲安平的新聞观点是資产阶級的新聞观点。他說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論有兩种，一种是歌功頌德，一种是教条主义。我們光明日报的工作人員是不同意儲安平的意見的。"張又君說，儲安平批評光明日报的社論是歌功頌德的。共产党有功，歌頌为什么不好呢？今后还是要歌頌。

有記者質問儲安平要把光明日报引向何处去

徐亦安說，儲安平来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就說，要写社論，就要写批評共产党的社論，写新聞就要写聳人听聞的新聞。儲安平还分别和許多編輯記者談話，自我标榜要走群众路綫，但当記者在牆报上質問他要把光明日报引向何处去；对他在中共中央統战部座談会上的發言提出批評时，他立刻問："这是支持我，还是打击我？"徐亦安还指出，儲安平是以解放前旧"观察"的中間路綫来办今天的光明日报的，这样下去，光明日报將成为反党反人民的报紙。

巴波說，儲安平在整風中派記者处处点火

会上有人提出，儲安平是想和党爭領导权，和人民爭天下的。許子美說，儲安平来光明日报就說"要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陈瑞紹說，有許多讀者来信駁斥儲安平的言論，但儲安平都压下来，究竟来了多少封信，別人誰也不知道，他建議把这些信公开出来。巴波說，儲安平这种思想对光明日报的工作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他派記者到各地举行座談会，处处点火，想把整風搞乱。

关世雄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無論何时都应批判

民盟市委秘書長关世雄說，也許有人怀疑正在大鳴大放，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批判？像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無論是什么时候都应当进行批判。

吳晗說，儲安平的思想是不要社会主义

民盟市委主任委員吳晗最后發言，他說：儲安平的中心思想是不要党的領导，不要社会主义。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当时我們是以此和国民党作斗爭的，儲安平現在說共产党是"党天下"，目的是使人將两个本質不同的党混淆起来，用意是很惡毒的。說共产党是"党天下"，是歪曲事实，民盟盟員就有很多是部長、省長、局長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員，这是不是可以說"盟天下"呢？儲安平說"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終根源，这就是不要党的領导。吳晗說，党群关系不好，某些地方是有的，儲安平把某些地方的缺点扩大为全国性的，把太陽的黑点扩大成为整个太陽，說太陽是黑的。儲安平說"非党副主席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这有什么宗派主义呢？至于总理和副总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手通过的。儲安平自己也是举了手的。工人問儲安平是否想推荐什么人，問得有道理。有人認为儲安平有勇气，但这是什么勇气，是对敌人的勇气，还是对人民的勇气。儲安平的思想会有一些影响，有些人是支持他的，所以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是完全必要的。

（6月11日北京日报）

光明日报民革、民盟联合大会揭發

儲安平反动言行

本报訊 本报工作人員在昨日民革和民盟光明日报支部联合举行的座談会上揭露，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等勾串一气的，有計划、有步驟地把光明日报拉向資产阶級政治方向。

徐亦安在会上說，本月8日下午兩点多儲安平向章伯鈞提出辞职的要求，三点多文匯报浦熙修就派記者来光明日报观察动靜。事后章伯鈞說，当时，浦熙修曾打电話問他准不准儲安平辞职，她要向上海文匯报拍發專电；浦熙修还找中共中央宣傳部陆定一部長和周揚副部長，要他們对此發表談話。徐亦安問道，儲安平提出辞职之事，当时連本报同人都还不知道，为什么文匯报的浦熙修知道得这么快？浦熙修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这件事發生在光明日报的工作同志就方向問題向儲安平提出質問之后，徐亦安認为，这是右派分子組織的一次政治上的反攻。

徐亦安說，当去年文匯报將迁上海复刊之时，在京若干报紙盟員联欢，文匯报总編輯徐鑄成曾說，罗隆基对文匯报方針曾有所指示，这是一；罗隆基要推荐陈新桂給儲安平主持光明日报筆政，这是二；浦熙修背后是什么人，是人所共知的这是三。徐亦安問道，光明日报走上資产阶級政治方向，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应負責任，文匯报的走上資产阶級政治方向，难道是簡單的問題么？

張歌今从历史上揭露章伯鈞一貫反共，一貫要兩面派手法，他指出本月12日發表的"代論"就是章伯鈞兩面派手法的表現。

張歌今說，儲安平对取消学校中党委制感兴趣。章伯鈞也曾叫民盟干部注意取消党委制問題。这种"巧合"不能不叫人怀疑。蔡端在發言中談到这个問題时說，在本报記者写北大的消息时，儲指示，要把取消党委制等問題突出。

于友說，儲安平在国际报道方面主張多用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訊社的消息，而且要不加分析批判地直接采用。他还安排要多报道資本主义国

家社会党的活动，多發帝国主义国家的言論，特別是中間路綫。这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結的宣傳計划，章伯鈞去年就在編輯部談过，这次由儲安平再次提出，也是章伯鈞指示的。

于友还揭露，章伯鈞、儲安平不但有方針有計划，而且有人事安排。例如，要陈新桂主持"言論"，要找費孝通来；在国际报道方面到別的报社去找人，儲只强調"重要的是才干、能力"。他要找的那些人中有人已証明是右派。

張西洛說，在儲到光明日报后，章对人說：今后的光明日报大有可为。他要用較多的时間擺在光明日报。儲来后，章經常来报社，有的同志說，章伯鈞兩个月中来报社的次数比过去八年还多，这是有他的目的的。張西洛說，章伯鈞4月6日在交通部民主党派小組会上說，他最不滿意表态，表态是八股，談話要照人民日报社論，錯了就是違反原則。章伯鈞诬蔑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协、人代会上的發言"异口同声千篇一律"；"眞正意見得不到發表，而不滿意的意見不敢講"。这同儲安平对本报过去社論的看法是完全吻合的。

熊劍英駁斥章伯鈞所謂"迟鈍"，"太不懂报"的謊話，指出章伯鈞不能推卸共謀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責任。他說，儲安平在报社曾一再强調"尊重章社長"，要"爭取章社長的領导"。儲安平常向章執报工作。儲安平要推翻橫排，取消"文字改革"專刊，这正符章伯鈞的主張。誰都知道本报是首創橫排的，但是，儲安平在編輯部会議上說这是"共产党报紙的淸一色"，他要局部改为直排，以体現百花齐放，和共产党报紙有个区別。

黃卓明說，儲安平在篡改光明日报方向时使用的手段是陰險的。儲强調方針方向是領导上的事，不許同志們提意見，而且要假手总編室来压制这些正当的質問。儲安平自己找来一个漫画家，准备專門利用各地座談会上"揭露"的材料，画政治諷刺画。同时又把选擇材料的事推在总編室，想假手于人。漫画家之来，旣無人事手續，总編室主任也不知道。召集編輯部部主任会議也不讓总編室主任知道，直接安排。

区至培說，儲安平强調"揭露"，"有聞必录"，說是要把人逼到牆角里挤出东西来。然而他自己去年在九三学社的某些談話却不要人發

表。他知道新聞是有选擇的。章伯鈞对"共产党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非常反感，而且辱駡説这話的是王八蛋。

陈季子說，儲安平强調要搞学术动态，要以資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为主而且要不加批判地利用。他指出，章伯鈞、儲安平还有兩套沒有来得及搞出来。其一要組織兩个顧問团，从政治上和編輯方針上指导光明日报的工作。在这兩个顧問团的名單里有罗隆基、費孝通等人。另一件事是准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大請其客。陈季子認为，这是在处处点火以后，再来扩大他們的政治影响。

农工民主党成員謝捷在会上空洞地指責章伯鈞和他的妻子的"政客行为"。徐亦安說道，謝捷同志自己对光明日报走向資产阶級政治方向是如何看法？張歌今說，当报社同志們对儲的荒謬言論非常憤慨的时候，謝捷曾表示要同儲安平划清界限，可是，她背地里又写信給章伯鈞，說她不同意同志們对儲安平进行批判。这是为了什么？謝捷在会議上沒有回答这个問題。

主持会議的民盟支部負責人巴波在座談会結束时說，从同志們發言中可以看出，光明日报政治方向一度被篡改是章伯鈞、儲安平等一起搞的。章伯鈞、儲安平不开社委会而要搞顧問团，右派分子是有組織有打算的。其次，提出辞职要求是政治反攻，文匯报記者的活动是有政治意圖的。巴波特别指出，在6月7日在儲安平最后主持的一次編輯会議上，儲安平接到章伯鈞的电話，說是章乃器說，你們光明日报在"收"了。为什么章伯鈞这样"及时地"把章乃器的意見提給儲加以指点？

光明日报共青团支部的揭發

儲安平到我們光明日报来虽然不到兩个月，却作了許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对我們青年一代也同样施展卑鄙技倆，企圖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攏，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領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准备下后备力量。

儲安平借着找青年"个别談話"的机会，首先否定我国人民的新聞教育制度，販卖英美資产阶級新聞教育制度。他假惺惺地打听了人民新聞教育制度之后，他就向他們提出問題。他問郑元珂：你和你們从大学來的同学們研究研究：現在的新聞教育有沒有必要？一个学新聞的大学畢業生和讀完中学就參加报紙工作的人，他們的工作能力有什么区别？尤有甚者，他和梅挺秀談話时，就公开污蔑我国人民的大学教育制度是"誤人子弟"。認为我們的新聞教育制度是搬苏联的。

在他否定我国的人民教育制度的同时，極力宣揚西方資产阶級的教育制度，特别是英国資产阶級的教育，英国資产阶級新聞教育。他說：美国的新聞教育，是培养你成为一个采訪員，能写消息、發新聞就行了；英国就不同，那是要你知道"一系列的系統的知識"，使你成为一个"政治家"，成为一个"具有指揮和影响政局的本領的評論員"。他很自傲地說，这也就是用一个主笔、总編輯的水平来培养記者編輯。不难看出，儲安平要把我們青年引到什么的道路上去。

他事先了解到一些青年对工作有意見的情况之后，他就分别地找去談話，打着"我也在大学里教过書，我最懂得青年"的幌子，向青年人进行摸底、拉攏和收买的活动。他找高煥揚第一次談話时，就这样摸底：你对报社有什么意見？有什么問題？有那些青年对工作有意見？……什么都可以談出来。有些担任助理編輯工作的青年去找他談工作問題，他就夸夸其談地談他的"干部原則"：第一，"我是主張把青年放出去的"（按指去作采訪工作）；第二，要提拔青年作領导工作。他并且鼓动青年处处要自我表現，他說："我年青的时候就爱表現自己；能够有表現的机会我都不放过"。又說："有了表現之后，自己不要說，讓别人說，这样力量就更大。"有一位青年向他發牢騷，說不想干了。他說，我年青时候也一样，合則留，不合則去。有一位資产阶級思想和資产阶級新聞观点比較严重的青年，儲安平和他談話后对他說："你报道首都新聞，有些可惜了（这位青年1956年才从大学畢業出来）这沒有發揮你的能力，你应該受到更好的培养！"

光明日报社同志揭發儲安平的反动言行

文　艺　部

文艺部6月18日下午，就前一时期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进行討論，大家同意高天、張友代表职工在社务委員会所作的报告，并从文艺部所接触到的章、儲篡改的步驟，陰謀加以揭露。这里，綜合了会上和会后交换的意見，报道如下：

根据記录，儲安平在社务委員会上，曾狡辯說，他原不想發言，作协、九三几次邀請都不去，統战部座談会也未出席，直到5月30日接到电話催請，才有6月1日的發言，来迴避發言稿事先經过罗隆基、章伯鈞等看过的追問。其实，不是那回事，本报資料室的同志曾在民革座談会揭發，儲在發言的前一个星期，就要她們找材料，找的就是49年的副主席副总理名單等资料。这說明不是匆促發言，而是处心积慮，有所准备；而故意延不出席，直到最后一次会才發言，也是有步驟的，是从"理論"上来体現章罗所提的"具体"措施。

根据記录，章伯鈞說他"感觉迟鈍"，对儲在报社的作为不大过問似的。其实，从文艺部这个部門所接触的来看，儲是秉承章的意圖行事，唱同一調門的。如章是反对文字改革的，儲到文艺部兩次会上，建議改版后的"文艺版"用直排，而且一再說是章伯鈞的意見、全部带头直排也是可以的。儲安平改版前（大概是七号）还送来一篇反对文字改革的文章，要在"文艺版"刊登。

改版沒有成功，"文艺版"沒有出現，但是儲安平兩次到文艺部开会，一再散布他的资产阶級办报思想。他在部和大会上否定了过去文化艺术部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包头的文化新面貌"（工矿区文化通訊之一），他举这个"不好"的典型，作为"报道分散"的例証。現在才知道他是不喜欢职工文化生活的新气象的。儲安平口口声声要我們学習过去的新民报和南京人报，希望"文艺版"成为茶余飯后的消遣的东西。他要我們学習文匯报，尤其是要学習它的"精神"，并在文艺部会上說：

"文匯报創造了頂标題，人民日报也跟着它屁股走，我反对这种沒有創造性的学習。"他这种揚文匯报抑人民日报的說法，和他"走在人民日报前面了"是同一腔調的。

儲安平在大会小会上都要求这三、四千字的版面，要有七、八条新聞。他反对編成副刊。他还在"民主园地"上表示态度，說要貢献全部知慧，和大家一起办好报紙。从我們所接触到的事实看，不是那回事。他想把报紙作为右派分子的論壇，和滿足私人的酬应、一点也不顧到办报的原則、方法。例如，他不要文艺部發長的通訊、特写。但是，自己組織了"特約記者梁誠瑞"的昆曲座談通訊，三千多字的長稿在第三版見报了。（正是改版未成的那天，事先，文艺部根本不知他發这稿）。要是改版成功，三版是文艺，四版也文艺，那眞使讀者糊塗。文艺部有关这类長稿是必須退的，造成步調不一他全不計較，他是拿报紙作为个人籠絡人的工具。也是我們前面提到的，他曾拿一篇"施氏食獅史"稿子，是篇只有一种音节無聊的挖苦文字改革的文字游戏。他却以郑重而不容商量地口气說："这篇稿子是錢偉長和周培源的夫人写的，如不用，早点給我，好用在三版"。他竟然忘記了要"新聞性"了。

"文艺版"虽然沒有出世，但是，这一段时期已經使文艺部工作同志人心惶惶，失却信心，不知如何是好了。也給文艺部工作造成許多困难，如一些可用的二三千字的稿子，退掉了，为改版約来的几百字的短稿，現在也不能不退，使积極写稿人疏远了；記者自己为了三天的新聞稿去奔跑采訪的"小玩艺"一再推延，大多报廢，浪費了不少精力。

国　际　部

国际部同志在本月22日上午就章、儲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期間，本部工作中的錯誤作了进一步檢查。

儲曾一再强調高級知識分子不爱看我报国际方面的文章和文化消息。他主張多报道資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直接采用外国通訊社的消息……。主張縮小国际版为一版的三分之二。在他的指导思想之下，我們停办了原有的綜合报道，国际文化广場、望远鏡等等。同志們認为他这样一笔抹杀是不对的。

儲安平主張原封不动地搬用外电是他篡夺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一个大陰謀。我們最初沒有觉察出来，我們認为对外电加以选擇，选澤那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方針的也許是可行的。

現在看來，西方通訊社是帝国主义的喉舌。他們的新聞报道是充滿着他們的政治观点的，是他們进行阶級斗爭、反对社会主义力量的手段。我們如果在报紙上直接采用外电，那末这就等于替帝国主义办报，散布毒素。在人民群众中混淆大是大非，就等于在社会主义陣营內倒戈，进攻我国人民。儲安平的这个意圖难道还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嗎？

儲安平主張大力报道資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曾指揮記者去采訪錫蘭平等社会党的消息。儲的意圖是要宣傳社会党的修正主义观点，他們指示是别有用心的。但是我們發表的这篇文章，并沒有附和儲的意圖。我們是从国际統一战綫的角度来报道的。

章、儲主張光明日报多宣傳社会党少宣傳共产党和工人党，理由仿佛也是从国际統一战綫的角度出發的。但是，如果光明日报独多宣傳社会党，独少宣傳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宣傳社会党为主，那末，这就不但發生輕重倒置的問題，而是發生国际报道的本質和方向的問題。就發生为社会主义宣傳，还是为修正主义宣傳的問題。所以章儲主張多宣傳社会党的方針是危險的，是在国际报道上篡改光明日报方向的又一陰謀。

学 校 教 育 部

6月20日，学校教育部的工作人員举行了一次座談会，漫談右派分子儲安平在本报社的一些手法及其給报社工作帶来的損失，由此揭發儲安平的右派嘴臉。

桑聖耀說：过去在采訪当中，自已認为不正确的东西就不写。可是儲安平却要我們有什么就写什么，而且要尖銳。我想，如果任何事不加分析研究都报道出来，又說明什么問題呢，我看只能起到坏的影响。有一天晚上，我自北大采訪回来正在写稿，儲安平来了，看了我写的稿件一部分的內容，要我把个别人員对取消党委制的意見在报道中突出地写出来，而对于合理化的建議却只要略帶一笔就行了。他这是什么意圖呢？他的这种指示，不能不使我們受到影响，也認为只要尖銳就是好的。这

种气氛給我們工作帶来極大的危害。复旦大学陈望道的談話，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写出来的。

錢杭綱說：儲安平剛来报社时到我們組內参加了一次座談会。在会上，我贊成把我們报紙办成眞正的民主党派的报紙，不仅要反映他們的意見和思想，同时还要进行教育。但是，儲安平的看法不同，他主張只要反映不要教育。另外，他主張只要新聞，有聞必录，不要問題报道。我当时說，学校里沒有多少新聞，每月要供稿二十多万字，不可能，更重要的，必須有指导性的問題报道，否則沒人要看的。可是他不同意。他是完全要以資产阶級的新聞观点来办报。我前次出外采訪，只好根据我們自己报紙的报道来进行工作，这就受到了儲安平很大的影响。当时还感到报紙上已經是大鳴大放，我却落在后面了。在武汉时我也写了一篇对于学生方面的报道，是受我报"北大民主牆"那篇报道的影响。那时以为只要大鳴大放就好，不知中央的方針政策，我們都直接、間接受了儲安平的影响。后来，看到儲安平的荒謬言論受到駁斥，我感到在外面工作不下去，立刻就回来了。儲安平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揭發出来之后，使我們不再受到他的更多的影响。可是他給我們报紙帶来的損失是極其严重的。人家說我們是資产阶級的报紙，我現在对出外采訪也不大願意了。

潘文彬說：儲安平妄想用資产阶級的一套的办法来办报，这是行不通的。他在报社这一段时期中，报社內部的斗爭不是沒有的，高天同志和有些干部都曾和他頂过。儲安平的手法是陰藏狡猾的，他用各种方法試探，用各种方法使其陰謀得逞。不过愈到后来愈明显，愈又看出，他是要办一張反对派的报紙，他認为我报过去的評論，不是歌功頌德的就是教条主义的，都是要不得的。他要的是什么評論呢，要的是反对共产党的評論。听說他要找陈新桂来报社主持笔政，也就是这个企圖。前些时，共青团大会和六一兒童节，我們建議写評論，可是他不同意。

丘挺接着說：这就是他要把言論抓在自己手里，不讓別人写。野心勃勃！

蔡端說：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的反社会主义言論，給我們报紙帶来了極其重大的損失。前天我到航空学院，他們举行了一个全校性的

反右派斗爭大会。在会上，許多人对右派分子給予猛烈的抨击。有人在發言中說："章伯鈞、儲安平把光明日报搞成清一色的右派，……"我听了这話，心中非常难过，如坐針氈。儲安平的搞法，使我們报紙走了一个短时期的錯誤道路，幸亏人民日报提出批評，才把我們从錯誤的道路上拉了回来。我們报社內部也和儲安平进行了斗爭，否則錯誤恐怕更大。

开会这一天，部內还有一些同志因出外采訪，沒有参加开会。

要 聞 部

儲安平在5月16日(或在此稍后)找要聞部主任曾巴波等商量人代会报道的办法。他提到兩点：（1）当人代会發生爭論的时候，就一下派出大批記者出去"征求意見"，制造輿論，影响大会；（2）从代表們所提出的問題中去找"新聞線索"，追踪报道。

現在看来，儲安平的用心是十分陰恶狠毒的。他显然不滿足于到处点火，还想趁人民代表大会期間来制造混乱，更大規模地利用光明日报来向党和政府进攻。

美 术 組

在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把本报拉向資产阶級政治方向的期間，除了文字方面揭發的事实之外，对有关漫画方面，也作了恶毒的安排。

儲安平来社以后，不与总編室和人事部門的任何同志商量，即开始物色能为他們資产阶級办报方針起配合作用的漫画家。五月間，他終于經过办"观察"杂志时的旧关系介紹来一位名叫肖里的漫画家。据他說这位漫画家已經职業化了，沒有固定的工作單位，非常合他的理想。而这位画家是不算为本报工作人員，却要騰出一間專門为他而設的办公室，不与本报美术組發生任何联系，由他直接指导，选定題目，供給繪画題材，准备每天作画一幅，配合右派分子对党的進攻。当肖里第一次来报社和儲安平談工作时，儲安平曾临时通知总編室工作人員黃卓明同志参加。經黃卓明揭發：儲安平在和肖里談工作时，强調光明日报对漫画的审稿，不象人民日报那末严肃，尺度要寬得多。并对肖里指示："可

以用漫画来表現的題材，現在很多，在各地座談会發言中所揭露出来的材料，都是漫画的很好題材"，背里也同意儲安平的看法。

儲安平曾不止一次的說过，中国的漫画家，都是学西洋的，全国只有兩位漫画家所画的画，是有个性的。他非常称賛这兩位漫画家，而其中一位就是他找来的肯里。認为他到光明日报来是大有所为的。

对于本社原有的美术組，儲安平还沒有到报社以前，通过本报駐上海記者傳达了他对于刊登一些反映經济建設的速写的看法，他認为是沒有什么意思。当然，宣傳社会主义建設的画，不管画的好坏，在右派分子看来都是"歌德"派，都是沒有意思的，所以才要另外找一个能由他直接指揮的漫画家。

現在，我們就来看看儲安平最称許的漫画家肯里，在他的方針指示之下画出来的漫画。

在6月7日，正是人民日报發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論的前一天，这位"有个性的漫画家"画了兩幅草圖，送給儲安平。一組上下兩幅的漫画，題为："戴着宗派主义眼鏡的人"。第一幅画着一个老干部可能是一个領导人。这位老干部被画家的笔描写得很丑恶，他夾着一个公事皮包，帶着一副有色眼鏡，走过一个双手倚在桌上看書的干部面前鄙視的說："哼"！一看書就想睡觉！"这个干部的身上写着"非党干部"；下一幅中，当这个老干部走到一位"党員干部"的面前，虽然这个党員干部手里拿着書，却是伏在桌上睡觉，笑迷迷的說："聽，睡了觉还想看書！"請看这位漫画家对老干部的污蔑是多么惡毒！这和儲安平所謂"党天下"的謬論中所說大部分共产党員都是不称职的低能兒不是同出一轍嗎？这位画家的另一組画"連环套"，共四幅，題为"某些党員的邏輯"。画中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意見書，站着向另外一位坐着的人（大概是領导干部）提意見。站着的干部是一副誠恳姿态，而坐着的却是瞪着一双大眼睛注視着他說："怎么，反对我嗎？"而接着这位領导干部就發出一連串的話："我是党員，你就是反对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就是反革命！"而画中的这位領导干部的形象也就一幅幅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凶，甚至拍起桌子来了。而这位提意見的干部的形象却是越来越小張口無言。最后，这位領导干部口沫四濺的說："反革命

就……”而这提意見的干部也就給他的口沫冲出很远，仰天跌了一跤。这幅連环画把共产党員丑化得簡直不像样子，在生活中間，那里存在着这样奇特的邏輯呢？

从以上这兩幅漫画草圖中，也就可以看出儲安平和这位“有个性的漫画家”在合謀什么！就可以看出儲安平怎样在企圖利用漫画的武器，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也就不难理解儲安平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位漫画家来，要在光明日报上發表什么样的漫画了。使儲安平失望的是他們的反党陰謀很快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强大反击，使他在漫画上的陰謀手段还来不及施展，就不得不离开光明日报。

附录：兩　幅　画

戴着会诉议眼镜的人





"连环画"

——某些党员的逻辑



编者按：

我[illegible]四幅漫画，留给读者[illegible]。

[illegible]

刘[illegible]

儲安平妄圖把九三学社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青島回来后的"突然积極"

在今年三月以前，儲安平有个較長时間住在青島，和另一个右派分子陆侃如等勾勾搭搭。据青島分社來稿报导，儲安平曾以社中央代表名义参加青島分社成立大会，又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身份应陆侃如之邀，向青島社員做过"新疆見聞"的演說。可見他和陆侃如等是有很多往还的。三月中，他离青到滬，会見了社中央宣傳部另一个副部長笪移今，表示他对社中央工作的"积極性"（野心），笪为此而写信給我說："儲××3同志回京，中央宣傳部負責有人云云"。三月下旬，儲安平果然回到北京，表現突然积極，把魔爪伸入了"社訊"編輯部。

魔爪伸入"社訊"編輯部

儲安平是九三学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社訊"主編。作为九三学社內部刊物的九三社訊本来奄奄一息地控制在另一个右派分子吳鉄峰的手中。我調到"社訊"編輯部之后，一切須仰承他的鼻息。从儲安平今年三月回京起，"社訊"工作和吳鉄峰划分开来。也就从这时起，一切稿件均須儲审閱决定，非儲签字不得付印，兩位副主編仅分审一部分稿件，無决定發表之权，我主要是做收發、校对、拼版等工作。

积極篡夺社中央的領导权

儲安平抓住"社訊"編輯部的主要陰謀之一是篡夺社中央領导权。首先他表演出异乎寻常的"积極"（每周到社兩天办公，参加社的各种会議，四出征求社員对"社訊"的意見等），以爭取群众，揚言將"以身作則"扭轉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風气。其次借着"社訊"的工作拉攏許德珩主席。儲安平是以反对許德珩的家長式作風而出現的，然而这只是表面。儲安平暗中却竭力揣摩和迎合許的右傾心理，企圖把許拉入他的怀抱，企圖把許和社內的左派隔离开来，从而把社中央的領导权操縱在自己的手里，从而把九三学社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儲安平知道

許自从党中央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之后，正在乘机大規模發展組織扩大自己的"政治資本"。他在主編第七期"社訊"的时候，大力推荐了上海分社秘書处付处長黃祖膜所写的一篇关于工程技术人員問題的專文。他命令我說："本期出版后，你馬上送一本給許老，他一定会高兴，因为这篇文章是有利于大發展的"。在今年四月一个月中，他借着"社訊"工作向許請示为名，看过許五次，有一次談話至二小时之久。（據許告人）。儲安平公然把社中央的存在問題归納为党对許沒有帮助的緣故。他說："許老想靠党員办社，（事实許并不真是如此。）但社內几个党員对他的帮助不大。"儲安平的这些胡說是有意挑撥党社关系，有意打击社內党員威信，而他自己却以許的"得力帮手"自命，陰謀篡取社中央領导权，使九三学社离开党离开社会主义。

發动向党攻勢

儲安平控制"社訊"的时候，正值鳴放期間，他向許德珩主席建議，用許本人名义召开"鳴""放"座談会，还用請吃飯的方法以广招徠。从此在社中央便連續举行了十几次座談会点起了向党进攻的火焰。第一次座談会許曾托儲用"社訊"編輯部名义主持，儲开了一个名單，还准备分别联系要大家准备意見，組織火力。以后許又另交科学文教委員会主持，儲为此大發牢騷，我才了解前情。儲办"社訊"的所謂"一套"，实际就是"放火"（如無选擇地登載"鳴""放"紀录，登載吳鉄峰所写的污蔑武汉地区肃反的文章等）；宣揚"大發展"思想；推广右派分子的文章（如选登高覺敷、周拾祿、陆侃如、陈时偉等的在二中全会的發言稿等）；压制左派文章，（如堅决不登李数同志反駁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等）；反对捍衛馬克思主义（如我曾建議組織文章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学术观点，儲不久說："考虑考虑吧"）总之，儲安平利用社的內部刊物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是不容抵賴的。

假辞职的陰謀

尽管儲安平多方迎合許主席的右傾心理，但是許对他还是有顧慮，很怕他会損害自己对社中央的独裁权力，所以对他还不够放手和信任。許的亲信吳鉄峰也是个"一把抓"的人物，不甘心失去他对"社

訊"的主权，所以不断与儲竞爭。五月中，儲突然向許辞职，并揚言要在"社訊"發表声明，以便造成对許的压力，經孙承佩同志力劝，才延迟發表。到后一期"社訊"拼版时，儲又命令我登载他的"辞职啓事。同时他知道社內的几位党員同志对許有意見，便企圖爭取他們对自已的同情和支持。曾經問过我，方亮同志对他的辞职有什么意見。又約王士哲同志面談。还写信到上海分社散播他主编"社訊"遭遇困难的消息，以便造成迫使許对他讓步的輿論。（笪移今来信問过此事）。这一切，都是他对許的一打一拉，以退为进，企圖进一步攫取社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加速把九三学社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詭計。

1957年8月18日 邢龙崴

儲安平和費孝通的来往

7月7日，中央民族学院开会批判費孝通时，費交出的一个"日記式的材料"中，記及与儲安平有六次接触，現節录如下：

5月31日

早上六时回到北京到"新观察"看了"重訪江村"的校样后，即到光明日报找儲安平。因为儲安平在5月20日曾打电报到苏州，說光明日报六月一日要改版，要我写文章。27日寄去"早春前后"。这次去就是想看一看"早春前后"的校样。見到儲，儲說6月1日不改版了，文章已見报了。

6月3日

6月2日或3日上午找刘春（按：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后，去找儲安平。儲安平又談起組織光明日报顧問团的事，我向儲表示，可以帮助他写文章，不做顧問。

4月15日儲安平曾来民族学院找我和潘光旦，要求帮忙。我提到光明日报副刊办得不好，后来有客人来，儲又去了。过一天，去看儲，第一次見到他的爱人，他們在青島結婚不久。这次，儲安平說："統战部

开过会，李部長說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負責办，統战部推荐我做总編輯。以后光明日报党組撤銷，要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这就是方針，要使光明日报成为高級知識分子的論壇。”我說很多人有顧虑不願写，儲說可以采取座談会方式。儲又問：“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为什么不給他，以后要我多給光明日报写稿，最好象“观察”那时一样，專辟一欄。那时儲談得很起劲，是把光明日报看成是他办的企業。并談及光明日报顧問团和要我到光明日报去的事。（問我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等等。）

6月4日

下午找汪鋒（按：是中央民委副主任）。“新观察”主編戈揚上午約我和儲安平当晚去前門外吃館子，还有張祖道、張鳳珠。

6月11日

看了人民日报：“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觉得不大对。那晚又去看儲安平，談到“党天下”的發言，他拿出一疊信来，說許多人支持他的發言，表示頗有群众。并談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編輯。要他再当总編輯，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眞心要辞职。

× × ×

三、儲安平交代的材料

儲安平在6月15、16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員会上的發言

我原來准备多听听各方面对我的意見。这兩天身体不好。但是一定要我来，我就來。原想听取大家的帮助，不想講話。越講可能就越錯。我从去年夏天……（講到这里插入說，是否可以不登报。又对着章伯鈞說：上次你在統战部邀約各民主党派領导人的会議上已公开提到，要我担任光明日报总編輯的工作是由党推荐的，現在我談当初的情况，大概可以。）去年6月，乔木同志到我家里去，征求我去光明日报工作的意見，我答应了。此后領导上安排我到青島去住下，先把新疆的材料写完。去年11月，伯鈞同志来信，各民主党派公推我担任光明日报总編輯，我复信接受这个工作，而且表示願意做好。2月底回到北京，政协会議以后于4月1日到光明日报。我对于光明日报的内部情况完全不了解，人亦不熟。我抱着兩点来办：①和大家团結商量，走群众路綫；②發揮集体領导的精神。过去兩月內在內部作了些安排。我作过一个报告，事前同常芝青、高天等同志反复研究过以后，又約各部主任討論后才提出的。这个改进工作的报告，主要部分都是有关編輯業务方面的問題。其中涉及方針的，就是如何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張民主党派的报紙。我說，据我个人的理解，民主党派本身的工作也在摸索之中。一般認为民主党派的作用有兩个方面，也就是双軌。一个方面是它为党的助手，組織和推动一部分社会成員学習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宣傳党的政策，号召大家积極参加社会主义建設。另一个方面是反映民主党派的成員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見并代表他們的合理要求。在回顧过去民主党派的工作时，有些認为前一个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較多些，后一个方面的工作做得

比較少。作为民主党派报紙的光明日报，过去恐怕也有同样的情形，以后是不是应該兩个方面都要兼顧并重。

我初去时，本来說明先了解情况，研究改进工作的方案，暫时不接触日常工作。但在四月下旬，我还是插了一手。那时当前最大的問題是鼓励大家鳴放，而又感到光明日报在鳴放的报导上落在后面，所以后来建議派記者到若干大城市去开座談会的办法。这同报社同志們也談过。共派出三路八个城市。青島是自己来要求开的。当然是想把报办好。可能有資产阶級思想在內，因当时各报在新聞上的竞爭确是很激烈的。光明日报本拟在6月1日改版，后延到10日。我自己原定8日开始当夜班。在此以前沒有当，也就是未直接处理具体的新聞版面，登了哪些新聞，題目怎样做的，都由原班人馬担任。我剛去时，一方面安排家务，一方面在外面联系。对于各民主党派也想分别請教，曾看过农工的宣傳部長严信民和民进的宣傳部長馮宾符。給民革的宣傳部長王昆侖先生打过七、八个电話，其中接通了三次，因王先生太忙，沒有見到。对于伯鈞同志，我認为应当主动爭取帮助，去談报了几次工作。我也看过薩空了、罗隆基各一次，北大去过兩次联系作者。

关于在統战部的發言。解放以后，一般来說，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展开以后，也很少講話。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發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則我对發言的积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么具体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战部座談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5月30日上午統战部来电話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听說6月1日还要开会。統战部彭处長希望我6月1日發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發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沒有外出。伯鈞同志說我的發言稿罗隆基看过，并無此事。关于党的成績方面，稿子头上原有个帽子，因自知版面挤，怕登在报上嫌長，刪掉了。

伯鈞同志何以会誤会我給罗隆基看过呢？恐怕是因为我和罗知隆基談过一次話的緣故。我和罗隆基先生兩人之間一向沒有来往，因我过去在"观察"上批評过他，有些熟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但既然担任光明日报的工作，就不能不和民主党派的人来往。我去看他主要是交换光明日报如何改进的意見，認为光明日报应該主动爭取民主党派的領导，希望各

民主党派也更积極帮助光明日报。其中也接触到如何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問題。在談这个問題时，曾談到党与非党的团結問題（我当时提到过十二个副总理中沒有一党外人士这一点），也还談到有些人对肃反有意見，又牽涉到宪法里对于人身保障的問題。（那些日子我自已也在考慮要不要在人代大会上講話以及講什么的問題）可能罗隆基先生事后和伯鈞同志提过此事，这样使伯鈞同志誤会我把我的發言稿事前請罗隆基看过，引起了这样一个誤会。

剛才我談派記者到各地去开座談会，是我在过去兩个月中所插手的比較大的一件事情。其他事情也过問了一些。剛才高天、張友兩同志的發言，特別是听了高天同志的發言，我看到我自己思想中确有资产阶級思想的成份，而在当时是不自覚的。高天同志所提的許多事情，大部分是事实，对于这些事实中的一部分，將来有机会我可以作些解釋。有些做法确实不对头。

× × ×

事实大体差不多，某些解釋有些不同。但如我再为自已解釋，就更加容易加重我的錯誤。例如外面誤傳我的發言的稿給罗隆基看这件事，引起九三很大的憤恨。我也沒有急于向九三学社的許德珩主席說明。即使有誤会，以后也可慢慢解釋。現在我应讓大家多批評。

× × ×

我是个人發言（編者注：指"党天下"言論），但也沒有申明是个人發言，發言稿上是注了"光明日报总編輯"的字样的。

× × ×

剛才大家希望我談，但我不願多为自已解釋。至于責任問題，伯鈞同志作为社長，負社長責任，我沒意見。我在此工作兩月，發生在版面上的問題，我应負責。

× × ×

向人民投降

7月13日儲安平在人代大会上的發言

我6月1日在統战部座談会上的發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錯誤。經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現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眞心誠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認罪。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發言是絕对錯誤的。首先，我說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領导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眞誠的大公無私的精神領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結人民。就以我們現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說，这一个成为全国和各級地方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主基础最广泛的政权組織。全国和各地的政治协商会議，更是最能体現党团結党外人士的統一战綫政策的。無論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或人民团体，都有大批的党外人士負担着主要的領导职位。党努力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遇事和党外人士协商，征求大家的意見。就以我自己的經驗来說，1954年夏天我去新疆的飞机票都定了，但是因为要协商人大代表的名單，政府希望我临时把飞机票退去，等协商有了結果再离开北京，这就說明党对团結党外人士是如何的重視和認眞。然而我在統战部座談会上的發言中，硬說"不論大小單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員做头兒，事無巨細都要党員点了头才算数"。我这样說，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認識，挑撥党和人民关系。其次，我們的宪法已經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針首先要由党員来执行。党指派党員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門工作，是党貫徹党的政策和履行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措施。事实告訴我們，凡是沒有党領导的地方（通过党員），党的政策便不能正确执行，工作便容易發生錯誤。因之，在我們的国家里，党員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門参加工作，是一个極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現象。不仅宪法里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导地位，就是在全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里，也

都把党看成是我們国家中的最大的財富，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領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党的存在和党的强大是保衛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建設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引导人民进入幸福美好生活的有力保証。中国人民都一致承認党給全国人民办了数也数不清的好事。全国人民正为在党的領导下而完成的一切偉大的成就而欢呼、自豪，从心底里感激着党。正因为这样，人們紛紛要求党选派党員去領导他們学習，領导他們工作。党的責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説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領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錯誤地把党説成是一个宗派組織，企圖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承認有些党員在思想作風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些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提高和加强党的力量，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風。可是我却把某些个别党員的缺点說成是党的缺点。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眞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領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論經不起駁斥，一經人民揭發，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我不仅在"党天下"的謬論中誹謗了党，而且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中，也做了許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在我担任总編輯的兩个多月內，光明日报刊登了許多恶意的、片面的、破坏性的报导，攻击党的領导，損害党的威信。我还派了好些記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蘭州、沈陽、長春、青島等九个城市去开座談会，專門找那些对党不滿的、勇于攻击党的人發言，企圖通过这样集中的形式来損害党的威信。我又發表了北大学生大字报的錯誤报导，表面上是搶新聞，实質上是点火。我不贊成多發表歌頌党的社論。我听到章罗联盟造謠的党要在大学撤退的消息，特别感到兴趣，并且还刊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不符事实的新聞。我还發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鼓励大家結合"互相监督"發言。我用一种資产阶級民主的观点来理解"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对于錯誤的报导和言論和正确的报导和言論不加区别。我又以同样錯誤的观点来理解"長期共存、互相监督"，妄想利用报紙来监督党，而监督的目的实質上就是要削弱党的領导。在我这种資产阶級的反动思想下，一度使光明日报迷失了政治方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道

路。而处处放火的結果首先是燒昏了我自己的头腦，使我6月1日在統战部座談会上發出了那篇“党天下”的謬論。

我这些錯誤的言論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性是極大的。它在一些比較落后的群众中間造成了思想混乱，使有些人在一个極短的时間里不明事实的眞象；它使某些对党有些不滿情緒的人格外增加了他們对党的不滿；它損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鼓动人們向党进攻。我所犯的錯誤，实質上又为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根据最近报紙的揭發，現在大家很明显的認清，章罗联盟是一个陰險的政治勾結，他們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党分庭抗礼，逐步篡夺領导。我的“党天下”的謬論实質上成为替他們的反党陰謀搖旗吶喊，而在那篇謬論中提出十二个副总理中沒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实际上也等于在替章伯鈞、罗隆基开口要求副总理的职位。我在5月19日去看罗隆基一次。从我自己的思想上来檢查，我去看罗隆基，实質上是想在政治上和他勾搭。可是我还沒有勾搭上他，倒給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場。罗隆基已經利用我直接向党进攻了一次。罗隆基还想利用我在这个大会上为肃反問題發言，利用我在光明日报上展开反对我国現行政治制度的討論和攻击五年計划的建設。幸而党領导人民对右派分子的斗爭發动得早，党救了我，使我避免犯更大更多的錯誤。章伯鈞一再指示光明日报多登人的新聞，他显然想利用光明日报来来加强对他个人活动的宣傳，以增加他的政治資本。章伯鈞又一再指示要光明日报多登資本主义国家的电訊，多注意中立国家政党和資本主义国家左派政党的介紹和报导，从这一点看来，章伯鈞不仅对国内政治有野心，而且他对国际政治也有野心，企圖通过一些国际活动来找寻帝国主义老板。他要求光明日报加强这方面的报导是要为他作进一步的国际活动創造条件。而我的一套資产阶級办报方針再加上我自己对党的領导有抵触情緒，这样，我在光明日报的一套做法就完全符合章罗联盟的要求，符合于他們的政治野心。

在国外，我的錯誤言論还为美蔣敌人所利用，使他們錯覺地以为中国有很多知識分子反对党、反对政府。他們以为在大陆上出現了什么为他們日夜夢想的变乱，于是兴風作浪、进行挑撥，还說要向我“遙致敬

意”，实际上無非想造謠生事，挑撥离間。我的錯誤的言論虽然为他們所利用，然而他們的希望只是一个夢想。在今天的中国，即使犯了錯誤的人，在党的寬大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下，仍然坚决要求改正自己的錯誤，从新做人，争取紧密地团結在党的周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業效力。以为中国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供美帝利用，那只是杜勒斯之流的幻想而已。

我这次犯的錯誤，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我受过多年的英美資产阶級教育，盲目崇拜腐朽的資产阶級民主。在解放以前，我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方面反对共产党。我在思想上宣傳資产阶級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标榜走中間路綫。我鼓吹“自由思想分子”团結起来，实际上就是不要人們跟共产党走。由于我只看到資产阶級一个阶級很小一部分所謂“民主自由”，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眞正的、更大的民主自由，因而便錯誤地認为“在国民党統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問題，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便变成‘有’‘無’問題了。”（1947年3月8日“观察”第6頁）我在“观察”复刊的时候，（1949年11月）初步地作了自我批評，否定了过去的立場，表示願意在党的領导下改造自己。但实际上，那时只是在政治上表明了一下态度，我自己的立場和思想并沒有眞正改变过来，因而解放后这几年来，表面上是接受党的領导，拥护党，而在实質上，仍然存在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一有机会，我就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当我初犯錯誤的时候，我沒有正确地認識我的錯誤。一个多月以来，經过全国人民和人民日报的批判，經过九三学社同志、光明日报同志以及人大江苏小組各位代表的帮助，才使我逐步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錯誤的严重。我認識到这次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一次猖狂进攻。当前的斗争是一場严肃的阶級战争。而在这場阶級斗爭中，我自己扮演了一个可耻的令人痛心的反动的角色。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錯誤的时候，我內心感到無比沉痛，感到無地自容。每天郵差同志送报紙信件到我門口，我自己都沒有臉到門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說我姓儲，深恐医生

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儲安平。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認識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沒有前途。我特别認識到，假如不是老老实实跟党走，个人就要走錯路，工作就要犯錯誤。这次我在光明日报所犯的錯誤，就是我受到的一次最大的教育。我必須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剝去我自己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到六亿人民的一边来。我决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并在批判我自己的錯誤的同时，积極参加全国反右派的斗爭。我对我的錯誤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認識，我应当繼續深入檢查自己的思想根源。繼續深入批判自己的錯誤言論。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場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眞誠地承認我的錯誤，向人民請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徹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帜。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領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8月1日在新聞工作座談会上的檢討

从四月一日到光明日报工作，到六月八日止。起初是了解情況，四月下旬我亲自布置九大城市座談会的报道。从五月初直接掌管編輯部業务到六月八日，一个多月里，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錯誤。我的錯誤非常严重。这是因为我受到資产阶級民主的毒害很深，我有反动的資产阶級民主的思想。我用資产阶級民主的观点理解"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把人民和党与政府对立起来。我錯誤地認为报紙要站在人民的立場，在政府与人民对立的时候，要多發表批評政府的文章。这种反动的資产阶級民主思想貫穿到我的全部工作和想法中，我还有严重的資产阶級新聞观点。但我現在檢查起来，我那資产阶級新聞观点、錯誤的資产阶級办报方針从政治观点来看，比刊登有趣味的东西、搶新聞等危害性更大。我是有搶新聞思想的，但主要是想在政治上批評党，来夺取群众。我过去写政論文章，旧观察也是政論性刊物，我是拿过去办观察那一套来办报紙。这是更反动的，危害性更大。在对党的态度上，我不是尊重、靠攏党，而是向党鬧独立、对立。这就使我在全部工作中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錯誤。我过去对这些錯誤認識是不深刻的，以后有了認識，又是站在个人角度来認識，为自己解釋，孤立地看，把它看成是偶然因素，沒有从阶級斗爭的角度看，后来在全国和同志对我的批判、帮助下，才使我認識到問題的本質。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向人民投降。

下面我就在光明日报的几个主要問題按时間先后交代，請同志們批判，帮助。

（一）九大城市座談会。我到报社后，我印象中重要的工作是搞鳴放。同时感到报社搞鳴放比較落后，这当然是錯誤的。在四月二十五号左右，我看到人民日报在天津开座談会。开座談会我本来也有这个想法，在旧社会里經常开，看了人民日报以后，就想光明日报是不是也可以开，又与同志們商量，后就派人到全国各地召开座談会，去的是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蘭州、沈陽、長春、以后还有青島。九大城

市，开了十一次，占了十二个版面，另外还發了許多專电、通訊。当时我沒有認識到这是错誤的，还很得意，認为过去像这样在全国开座談会还沒有人做过，这是我到光明日报后第一次亲自組織的工作。我想以后再遇到重要問題，值得在全国討論，这个办法还可以采用。当时还顧虑人民日报在天津开了，也可能在別的地方开，考虑到如果人民日报到別的地方开，我們就不开，这說明了自己是不願意跟人民日报走的思想。我拚命地想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报紙，到各地开座談会要依靠各民主党派，如何找人、如何开等。沒想到要依靠地方党委，这說明我是一貫地不重視党的領导。我認为光明日报以文教为重点，又考虑是張民主党派报紙，邀請人就要考虑到平衡。我又說，要找意見多而又勇于發言的人来参加。这又暴露了我是想找那些向党进攻的人，用这种形式損害党的威信，这样做的效果很坏，一方面，打乱了当地的整風步驟，如西安、武汉、沈陽等处，在許多地方起了点火作用，我还主張全文照登，使报上充滿了对党惡意的攻击，版面上一团漆黑，使报紙不能确切的反映现实。

（二）学生大字报問題。五月二十五日，听到"九三"有一編刊物的同志說，北大学生用大字报，我打电話給潘文彬同志，他說这事早已露报了，我說不知道，我就要他去采訪，以后写成稿子，高天不贊成登，我坚持要登，最后在二十六日見了报。在这事以后，学校教育部又到北京各大学采訪了一次各大学学生鳴放情况，这次采訪不是我布置的，但我是同意的，采訪回来后，高天不主張报道，說这会鼓动起全国学生来鳴放，这对整風、对国家不利，我却坚持要發表，以后考虑到他可能是代表党組織說話，也就放弃了。这件事在我檢查起来最能代表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有一基本錯誤思想，就是認为人民和政府对立，这当然是資产阶級民主思想，而在人民和政府对立时，报紙有时也可以站在人民立場。大字报事情，我認为已是公开了的新聞，很多人都知道，不登好不好？不登反而会有損报紙在人民中的威信。人民日报不登，光明日报登了，可以爭取群众，这样，一方面搶到了新聞，一方面又爭取到了右派分子的欢迎。这实际上是把党和政府对立了。这事还暴露了我的反党态度，片面地强調独立自主，要看能做到什么程度，要

碰碰看，要看放到什么界限。这說明我不是爭取党的領导，而是采取对立的态度。高天同志对我是采取团結、說理态度，态度很平靜，而我却对他有不礼貌的地方。

（3）党委制問題。在报館里听到章罗同盟造謠說毛主席說要撤退党委制，而我則一直以为党管事太多，而高級知識分子是可以發揮更多的作用。五月六日，听說統战部要討論清华大学党委制問題，我一听到就主張發表，这一方面是搶独家新聞，一方面是为章罗同盟造成高等学校党委制可以取消的社会輿論，以后就登了这条新聞，而題目又是討論取消党委制。还有一件事情，六月二日，我們又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假消息，第三天，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批評我們完全不符事实的消息，我还不認識錯誤，反而又派人去訪問陈望道校長想找些材料，为自己掩护。

（4）發了許多約稿的信。領导上說过我們要联系一批知識分子。我到光明日报去了以后，同志們也覺得联系作者工作要加强，过去联系的对象有兩种，一种是民主党派成員，一种是高級知識分子。民主党派成員方面，我找过民革、民进、农工，請他开几張約稿名單，关于高級知識分子，我則尽我所知道的在六月初發了一百一十多封信，印好的，我在信中說我們的努力目标是要把光明日报办成为民主党派成員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論壇，我还写道我們不擇題目，由大家自由說話，自由写要写的題目，我还写如果能够結合互相监督来写則更好。这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做法，一方面是在組織一批人来向党进攻，想把报紙办成批評党、政府，监督党的論壇，也就是向党进攻的論壇，这暴露了我的資产阶級办报方向。我企圖要这些人对党不滿。我說过我反对把报紙办成反对派的报紙，但我实际上却是朝着这条路上面走去。我是从同党对立角度組織人来批評党，用資产阶級民主看法来理解“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以为这就是要大家什么都講，而沒有共同基础。比如毛主席講的六条标准，我就不知道。我企圖通过这件事来监督党，实际上是企圖削弱党的領导。联系到这件事，我还有一个想法，这想法沒与人講过，那就是希望每一个民主党派里总有一兩位来担任报館編輯部顧問，这一方面可以作为社务委員会助手，一方面也可加强編輯部力量。我想过找那些人，这

名單从来沒有提出过，現在是講思想活动，我就談一下，这名單只是在犯了錯誤后曾与某一党員同志說过，还沒与別人談过。那就是：民革找兩个人，王昆侖，另一人想請王昆侖推荐；民盟找兩人，費孝通和錢偉長；民建找孙曉邨和吳大琨，民进找馮賓符和严景耀，农工找严信民，另請严推荐一人；九三找袁翰青和周培源，致公因人不熟，沒想好，台盟想找李純青。这件事我与費孝通談过兩次，想請他来帮忙，他願意写稿，但不願意同报館發生进一步的关系。五月二十六日，我与錢偉長也談过，表示想請人来做顧問，我沒有提出要請他，他也沒表示什么。六月二日我与章伯鈞談过找顧問，他贊成找人，但不贊成每个党派都有人。

（五）我对国际新聞的看法也是很反动的。我同国际部同志說过，中国知識分子关心国际时事，但我又把費孝通的"早春天气"看成代表性文件，那文章里說知識分子不关心国际时事，我說，一方面大家关心国际时事，另一方面又不关心，这是因为現在国际新聞面太窄了，我就建議适当采用資本主义国家新聞，贊成多登些外論，这实际上是使資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宣傳在我們国家里泛濫。在对待国际时事問題上，我也完全失去了阶級立場。我一次同国际部同志講，現在在反映英国人民意見时，常常以工人日报为代表，但許多学生都知道，工人日报在英国生活中力量很薄弱，不一定能代表英国人民的意見。这說明我还不能从工人阶級立場来看問題。

（六）我在报館曾找到兩三个剛从大学畢業不久的青年談話。我对他們不仅沒有什么帮助，反而起了些有害作用。有一同志对工作非常不滿意，牢騷發的很多，与領导鬧对立，而我却說这是合理的，可貴的，我实际上不是批評他，而是慫慂他。因为他們是新聞系畢業的，我还同他們講到美国、英国的新聞学。我說解放前大学一般是采用美国的新聞学。他們培养編輯就是編輯，記者就是記者，做广告的就是广告。我說，我过去也是不贊成这样。又談到英国的新聞学，那主要是訓練政治評論員，学習的課目不多，只是历史、近代历史、政治、經济、文学史、文学批評史。我說美国是培养記者，英国是培养政治評論員。我又問解放后他們学的怎样，他們說学的很少。这次談話实际上是挑撥他們对新

大学的不滿。他們有人不滿意現在工作，我表示不滿是可以理解的，贊成他們在外边跑跑，要他結合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来考慮工作。

除了上述具体工作暴露我的反党思想外，还有6月1日在国际俱乐部招待民主党派的宣傳干部会上的談話。我說过去光明日报社論容易写，今后要难写了。过去的社論有些是对党歌功頌德的，有些是四平八稳，是教条，当然都不会出毛病，这些都是很反动的，对党有成績为什么不能歌頌呢？我不願写歌頌党的社論，这是不重視社論对讀者的教育作用。我对民主党派也有很多錯誤看法，我認为它有兩个任务，一是組織推动对成員进行改造，宣揚党的政策，动員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一是反映他們意見，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合理要求，我認为光明日报过去第一方面做的多，而代表方面做的少。实际上，教育成員就是代表他們最大的利益。但我却割裂起来看，認为教育不是代表，想利用报紙多發表代表他們的言論、报道，要貫徹双监制，多报道政府缺点，群众困难。

我在辞职問題上也犯了錯誤。六月七日，报館里有一个同志对我提出批評，我以为这是个人对我有意見，六月八日早上，还想找同志談談，后来看到人民日报社論，又看到报館許多同志的大字报批評，我知道犯了政治性錯誤，在报館很难工作下去，就想到要提出辞职，八日見到章伯鈞，提出辞职書，章伯鈞同意留下辞职書。我去章伯鈞那里以前，接到楼邦彦电話，說要看看我，我以为是說要在九三开会时碰头，我告訴他我不去，他說不是，我就去看了他，他說浦熙修要組織他写文章批評我，实际上是支持我，問我發言情况。我告訴他报館辞职事情，他說浦熙修以后还要与他联系，我就要他告訴浦熙修我辞职事，我是想要浦熙修在文滙报上發消息，爭取社会上的同情。这件事又暴露了自己的反党思想。

这几件事是我一个多月中的主要錯誤。下面还要談談我与章伯鈞、罗隆基、錢偉長等人的联系，其中章、罗、錢在报上已登过了。現在談談与徐鑄成的联系。二月份我在青島，以后要到北京，上海很多时候沒去，就在来北京时中途去上海一次。因为我要到光明日报来，就去看了徐鑄成，我們談話主要是百家爭鳴問題，他說上海顧慮还很多，还不敢說，具体地談到电影討論方面他表示也已遇到了困难。他說組織了正面文

意，但都沒有拿到，他又說，批評只能从反面开始的，只能是片面的。百花齐放本来是文艺上推陈出新的意思，百家爭鳴則是学术上的，由于我的錯誤思想，以为这是想要大家多講話，我把这八个字理解到政治上去，認为是鼓励大家多講話。我說，百家爭鳴是全面的，电影討論只是局部的，如电影都不能談，还能談什么百家爭鳴。另外，他还談到非党报在某些待遇上，具体来說如报紙配給上，还有些受到歧視。他說將来大公、光明、文匯三报可以多交換些意見，那时因我还沒有到报館去，沒有接下去說什么。还有一次我們还吃了一次飯，其中有陆詒、王恒守、赵超构和光明日报駐上海的几个記者。

（根据儲安平發言的原記录整理）

儲安平的交待

一、和罗隆基的来往

我在光华大学讀書的时候（1928——1932），罗隆基是我的先生。那时候我和他有过一些来往，在資产阶級民主和反对国民党統治这两点上，我在思想上受他一定的影响。1932年我在光华畢業，罗隆基也离开上海到天津益世报任主筆。1934年我来北京結婚，和他見过一次面。

大約在1937年的春天，那时我正在倫敦讀書，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的社長（在宋哲元时代），他托人要我給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訊。我是积了三年稿費才到英国去讀書的，我在英国讀書的时候生活很苦，所以願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費来支持自己的讀書。当时我給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信，但是始終沒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沒有收到一分稿費。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情，我从来沒有提过。这是我后来同罗隆基不大来往的一个原因。

1938年回国以后，又听到罗隆基的一些私生活，心中不直其为人。后来我在"观察"上曾經批評过他四个字："德不济才"。据說他不大高兴。不久，梁实秋写了一篇"罗隆基論"，是恭維罗的，梁实秋把那篇稿子寄給"观察"，我觉得罗隆基还是一个可以爭論的人物，还不能像梁实秋所評价的那样好，所以这篇稿子我沒有在"观察"上發表（这

篇稿了后来在南京的一家刊物上發表了），听說这一件事罗先生心中对我也很不高兴。

我和罗先生彼此之間，心中都有些芥蒂，所以平时除了在公共場合点头招呼以外，私人之間沒有來往。

我4月1日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考慮到既然做民主党派报紙的工作，就应当和民主党派人士有些來往。从5月中旬起，我先后拜訪过几个人：其中有民进的中央宣傳部長馮宾符，农工的中央宣傳部長严信民，我也和民革的中央宣傳部長王昆侖联系过几次，但是沒有看到。此外还看了民盟的罗隆基和薩空了各一次。

我去看罗隆基是5月19日（星期日）上午九点三刻左右，离开时約为十一点，这是1934年以后我第一次專門去看罗隆基。由于多年沒有来往，开始寒暄了一些我去新疆旅行以及在青島写稿的情况，接着談到光明日报工作的情况以及怎样改革版面的打算。（关于怎样改革版面，如加强新聞、減少專刊、改进編排式样等，大致已見我于5月7日在光明日报所作关于改进报紙工作的报告）。

我去看罗隆基，是想談談今后各民主党派如何很好地来帮助光明日报。他問我是不是有一个管理机構，我說有一个社务委員会，由各民主党派及無党派民主人士各推一人組成，这个社务委員会是光明日报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大政方針应該由社务委員会討論决定，伯鈞同志还沒有召开过社务委員会，希望不久就能召开。我又說：上次在中央統战部邀請各民主党派領导人的会議上，伯鈞同志表示要成立一个顧問团，包括郭沫老、張奚老、馬寅老和罗隆基等人，吃吃飯，談談，給光明日报提提意見。罗說：“这很好，不过伯鈞同志这个人，他的長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心大意，要靠他来主持这样的会，恐怕靠不住，还是要你自已来。”我說：“我不成，我的身份还主持不了这样的会。”我說我倒想，就各民主党派各約几位爱写文章的先生，做光明日报編輯部的顧間，帮助光明日报編輯部出出主意，联系一些作者，作为社务委員会的輔助，多和民主党派通通气。罗說这样也好，办报不能关在屋子里办，要出来多通通气，摸摸政治行情。否則跑得太快了，要栽跟头，太慢了，又落在后面了。”

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党和各民主党派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以后，关于民主党派以及民主党派的报紙怎样貫徹这个方針的問題，大家都不清楚，不知究竟該怎样做。假如光明日报要体現"互相监督"，必須密切地在各民主党派的領导之下，才能进行，否則容易發生毛病。这个問題我原来也想听听罗隆基的意見的，但是沒有談下去，因为这时罗隆基談到了4月30日毛主席約他們談話的事情。罗隆基說：毛主席那天对大家表示：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見。我听到罗隆基說毛主席征求大家对他提意見，我就想到十二位副总理里沒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我問罗，这个問題能不能談，他說可以談。

我这时問罗，这次的"人大"主要內容是什么？他說这次"人大"要討論1956年的决算和1957的預算。据他估計，在"人大"开完以后，对于当前国家的政治制度，可能要展开一个时期的討論。此外，他認为，关于五年計划也可以約一些对于經济建設問題內行的人，展开一些討論。

毛主席在2月27日的报告中說，对于肃反問題打算全面檢查一次。我因为看到报紙上鳴放座談中反映一些肃反运动中的問題，所以那时我也贊成由人大常委会联合政协全国委員会檢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贊成在肃反中有意見的人，可以列举事实报告人大常委会請求檢查。我对罗說，假如要在人大發言，我想談談这个問題。罗說，这个問題可以談。又說宪法里面的有些地方也可以談。例如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提前完成，这是出乎制訂宪法时的估計的，所以現在宪法里有些条文和实际的情况已有所出入，他說，这些方面也可以談談。我当时沒有理解到他的意見，現在回想起来，是不是罗隆基有修改宪法的意思，而暗示我出来發言？

罗最后劝我不要終日把自己陷在事务里，鼓励我出来多走动走动，和各方面多接触接触。我說目前还有困难，因为社里人力很薄，我整天地在社內，甚至有些星期日，以及"五一""五二"这些假日，我也都要去报社办公。这时罗說起民盟的陈新桂曾兩次向章伯鈞表示想入光明日报工作，我問罗：陈新桂过去有沒有从事过新聞工作？能力如何？罗說：陈新桂过去跟他一起在四川办过民主报，人很能干。又說，在民盟总部的工作干部中，陈新桂的理論水平是比較高的。我又問罗，陈新桂

的为人作風如何，是不是容易和人共事，罗說，这一点也要說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話就当面説，不顧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我因为和陈新桂不熟，所以回报社后，就把这情况告訴总編室主任高天同志（党員），高天同志是民盟候补中委，情况可能比較了解些。后来高天同志去民盟了解了一次。我后来見章伯鈞提起此事时，章表示不贊成。

5月15日以后，我和罗隆基再也沒有过任何接触。（6月27日記）

二、和章伯鈞的来往

一、1949年春天，在怀仁堂召开欢迎从东北来北京的民主人士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認識章伯鈞。私人之間沒有来往。

1956年6、7月，我吃过章伯鈞兩次飯，一次是章招待民盟盟員中从事新聞工作的，到有薩空了、徐鑄成、蕭乾和我等，那次沒有談什么具体問題，但章伯鈞向我們宣傳了他对新聞工作的一些反动的意見，認为非党报和党报应該有所分工，而贊成非党报紙多登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电訊。飯后就散。第二次飯也在章伯鈞家里，主人方面有章、罗隆基、曾昭掄和关世雄（民盟市委秘書長），客人方面有馬連良、戴爱蓮和我等，是为了向台灣广播的問題。过了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新疆沿時后部队的情况，写給了关世雄。

1956年11月下旬，那时我在青島写新疆游記，收到章伯鈞的信，說各民主党派公推我担任光明日报总編輯。这件事1956年7月，胡乔木同志已征求过我的同意，所以我当时复信給章伯鈞，表示接受这个任务。

1957年2月底我返北京，3月初去看章伯鈞，章約定改日再約薩空了、三个人先談一下，因为薩空了是光明日报社务委員会的秘書長。大約是3月20日，我們三人談了一次。章伯鈞和薩空了簡單地介紹了光明日报过去的历史，他們要我先談談。我說对报社的情况完全不清楚，关于編輯工作方面的問題，要进报社了解情况以后才能提出来，当时也談了几点，大致要加强一些新聞，取消一些专刊等。我要求最初一兩个月不接管日常業务，以便向社内同志了解情况，交換意見，研究改革的办法。章伯鈞表示同意。当时章伯鈞說："我办报是外行，提不出意見。只想到一点，將来在机構方面，社务委員会之下，除了我这个社長外，

是否再加上三个副社長，例如一个可以是薩空了，一个可以是常芝青，一个可以是你，这样可以有人很好地帮助你，否則將来只有你一人，恐怕不好办事。至于我这个社長，倘不管事，你將来要找我时，恐怕連我的人也找不到。”那时章伯鈞又談了一个具体意見：报紙可以考慮直排。他說，毛主席也說过，要是想改直排，也可以試試。章說，即使不全部直排，也可局部直排。

那次說定四月一日我去光明日报，由章伯鈞陪我去。

二、四月一日上午九时，章伯鈞陪我去光明日报，他在路上向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見，希望光明日报以后多登一些人的新聞。他說，旧社会的报紙很重視人的新聞，現在一般报紙都不大注意人的新聞。他又說：“現在什么事情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报紙上也就只見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怎能弄好？”

此外，他还贊成少登教条主义的东西，他說，过去有些假馬克思主义者，把文章送到光明日报，还打电話去指定要登。章伯鈞說：“以后这种教条主义文章，我們硬是不登。”

到了报社，各部級主任都在欢迎我們，章伯鈞說：“我把儲安平同志帶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兩三分鐘，他又和別人閑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鐘，他就先走了。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覚：章伯鈞并不欢迎我做光明日报的总編輯。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沒有私人淵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編輯，他也不好拒絕。由于我感覚到这种情况，因而我就想到，假如我的頂头上司存心和我为难，那我在工作中將会增加很多的困难，所以我想，我应該按規矩办事，按时向他会报工作，免得他疑心我把报館的事情一把抓，不向他請示。所以4月1日去时，我答应在四月下旬向他会报工作。

三、4月21日（星期日）我第一次向章伯鈞会报工作，那时我在报社里已交談了九十多位同志，和原任总編輯常芝青同志及总編輯室主任高天同志（兩位都是党員），对于各个問題也都取得一致的意見，然后我再去向章伯鈞会报請示。我向他会报了一些主要的做法，包括民主党派报紙兩个方面的作用，增加民主党派的报导，进一步明确宣傳的重

点，增加新聞，打算取消五个專刊，保留三个專刊，局部調整一些机構，改进編排的形式，工作时間適应报紙的需要等等（詳見我5月7日在光明日报所作的"关于改进我报工作的几点意見"。）章伯鈞表示同意，并說支持我。

那天他对国际新聞特别作了兩点指示。一点是他主張采用一些資本主义国家通信社的电訊，另一点是主張增加对中立国家的政党（如印度的国大党等）的介紹。他有这样的意見：在国际統一战綫工作中，中国可以做很多工作；有些工作苏联不適宜做，可以由中国来做。在中国，有些国际統一战綫工作共产党不方便做，可以由民主党派来做。某些材料人民日报不便登，可以在光明日报上登。他又說，关于这个問題，他要去和周总理談。

那天他又談到增加人的新聞的問題。他虽未說明，但猜度他的意思，是希望光明日报多登一些民主党派領导人物的活动消息。

关于社务委員会，他那天又提出一个新的想法，想成立一个常务委員会。他說希望过了5月5日召开社务委員会，要我准备一下。我說，关于召开的日期，我等他的通知。

四、5月15日前后（确日不忆）我用書面向章伯鈞会报了4月21日以后那21多天来报社的工作情况，主要是（1）改进报紙工作方案已向全体报告，經过討論后，大家基本上同意，就打算照这样做。（2）为了克服工作中的某些矛盾，局部地調整了編輯部一部分机構，人事尽可能不动。（3）4月底派了一些記者到几个大城市开座談会（4）外傳由于我入光明日报工作后，光明日报上关于九三学社的新聞就多了，我說这是誤会。（5）打算6月1日改革版面。

五、过了一兩天，章伯鈞自已到报社里来了，那天他指示了几点：（1）科学院学部大会的消息应放手报导。（2）他打算由光明日报請一次客，（請那些科学院学部委員）要我开一个名單。（3）他指示应对正在北京訪問的錫蘭新平等党代表訪問一下。（4）对日本来华講学的物理学家，也可以去訪問一下，还应該有他們的照片。結合后面的兩点，章伯鈞說，以后光明日报应該多訪問一些从外国来华訪問的国际朋友。当然，他所指的外国，主要是指那些中立国家或資本主义国家。他

具体地指示·以后关于从外国来华訪問的共产党方面的外宾，主要由人民日报管，光明日报可以不管，关于青年、妇女、工会等方面的外宾，光明日报也可以不管。下列几种外宾則由光明日报管（1）保衛世界和平方面的外宾，（2）外国議会的代表，（3）外国科学文教方面的代表。

此外，他看到最近一期的“文学遺产”專刊上一篇文章長到一万多字，他說是不是可以把專刊停掉一些，多登些鳴放的材料。民主党派座談会的消息要多登，否則各民主党派就有意見。

六、我因为对科学院学部委員的情况不很了解，章伯鈞要的請客名單，我請报社內部的主管部門开了一个名單，我在5月19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半送給章伯鈞，請他批。当时他决定在5月21、23兩天分兩次請，每次請二三十人，我請他把名單决定后，在5月20日送还我，以便去定菜。过一天章伯鈞的秘書洪同志通知我，請客作罢。后来据章伯鈞解釋，学部委員太多，請了这，不請那，有困难，还是不請吧。

七、6月2日（星期日）上午九时我去看章伯鈞，因为有好几件事要向他請示。我去时，他剛看过当天的人民日报，他說：“你昨天在統战部的發言很好。”

我說：“要談就談些大問題，放肆得很。”

他說：“現行政治上一些人，大都只談些鷄毛蒜皮的事情，要些汽車、干部、房子之类，能談大問題的人不多。”

接着我便向他請示我打算去向他請示的一些問題：

1、关于基本建設的地点問題。前次章伯鈞已决定在阜成門內路南。后来光明日报行政部主任报告，那兒要拆迁250間房屋，恐怕困难是很多，否可以选用前門大公报对面的那塊地？章表示：还是选西單商場的那一塊地。至于房子的規模，他說不要太大，可以每天出版兩張为設計的标准。

2、光明日报曾經先后經原总編輯常芝青同志、国际部主任于友同志，总編室主任張友同志和大公报总編輯袁毓明同志（上述四位均党員）联系三次，想由大公报支援光明日报一些人力。我报告章，說我想去拜訪大公报社社長王芸生先生，問章是否同意？要否写封信帶去？章

同意我去找王芸生，說信不要帶了，因为我和王芸生也很熟，他說他見到王时也可提一下。

3、我說，罗隆基曾提到陈新桂想入光明日报工作事，問章意見，章表示不贊成。因为談陈新桂又順便提起有沒有可能讓費孝通也來光明日报分負一部分責任，章表示費太忙，恐不可能。但他贊成請几个人做編輯部顧問帮助我，章当时提出費孝通、蔣伯贊、胡繩三个人的名字。他說不必每一个民主党派都要有，还是以人为主。这事当天談到这里，沒有談下去。

4、关于"文字改革"專刊是否續出的問題，章表示"讓'文字改革'出下去吧，否則他們說我反对文字改革。"

5、6月16日光明日报八周紀念，如何安排。章說6月16日可請一次客，客人为（1）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長、宣傳部長、宣傳部副部長。（2）無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陈叔通、馬寅初、張奚若、沈雁冰、丁西林。（3）中共中央統战部部長副部長。（4）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副部長。（5）新聞工作者协会会長副会長等人，另外打算演一次京劇，使光明日报的职工同庆，同时送一部分票子給各民主党派。

6、我問章伯鈞，社务委員会究竟何时开？我說最好能在八周年紀念以前开。我建議在六月十日前后开。章表示同意，但仍未表示确期。

7、七十一岁老教授錢基博投給光明日报一稿，批評党。我覺得份量太重，故送請章看一下，請示如何处理。

我談了三刻鐘光景，即辞出去看薩空了同志。

八、6月5日下午，章到报社，那时費孝通也来看我（先来）。光明日报6月2日刊載上海复旦大学校長陈望道的談話，說复旦已取消了党委制。6月4日人民日报說無此事，六月五日光明日报也作了更正。章到报社来，通知我以后这类重大新聞，最好隔一天再登，以慎重为是。又說，以后少登刺激性的文章。

章和費孝通又談了起来。章大意說："目前情況很严重，学生情緒不稳，事情究竟怎么办？我們这时說話又不好，不說話又不好，工作很难做。"費說：除非用軍队来压，但那样，事情就做坏了。章說："那

样当然不好，臉上要化花臉了。”他表示局势还是有办法的，他說：“我們跟毛主席走，我們应該出来帮同收拾，”章只坐了几分鐘就走了（按：当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間，章一共到报社来过三次，一次是五月十七（？）一次是六月五日，另一次是哪一天，記不起来了。）

九、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时，章伯鈞曾給我打过兩次电話。一次是五月二十日（大約）要我通知报社行政部，写一封信給邮电部長朱学范，請邮电部增加光明日报零售报的份数，以及帮助推銷光明日报。另一次电話是月6日7下午打的，說章乃器对光明日报有意見，認为最近几天的光明日报是在“收”了，又說章乃器对于儲安平去光明日报工作，事前不知，表示不滿。章伯鈞指示社內派一人去向章乃器說明，关于儲至光明日报工作事，曾通知过民建的黄任老。章伯鈞在电話中又說，朱学范对光明日报也不滿，說將在民革座談会上批評光明日报。

十、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上批評我的錯誤言論，光明日报的工作同志也在社內用大字报批評我，我考虑我不能再在光明日报工作下去，下午二时去章伯鈞家里，提出辞职。我把情况說了一下，他同意我把辞职信留下，他說：“我这里沒有外人，你有話尽管說，”但我除了辞职以外，也沒有別的話要說，同时章說二时半統战部副部長于毅夫要去看他，所以我就匆匆辞出。

十一、6月9日（星期日）上午，章伯鈞到我家里来看我。（他共到我家里二次，第一次是3月初旬，是来回看我的）据他說，他是来和我說这样几件事情的：（1）原訂6月16日光明日报八周年紀念請一次客的，还是取消吧。因为現在大家心情都不安，这时請客不合适、（2）原定要演京剧仍將演，使报社职工可以欢乐一天，（3）他打算在6月10日分別写信給李維汉部長和中宣部張际春副部長，报告我提出辞职的問題。

对于章談的几点，我当然沒有什么意見。

后来他問我：“你的負担重不重？”

我說：“还好，”

他說：“有三种情况比較困难，（1）是身体不好，（2）名利心很重，（3）生活压迫。”

我說我的名利心是比較淡的，生活負担也还好，只是身体不大好。

他說，現在党有几个困难（1）农民問題不能解决，（2）学生出路問題不能解决，（3）五年計划有缺点。

我說：这些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只是不願說出来。

他又說，党还有一个問題不容易解决，現在有一千多万党員，做了党員的，科員想升副科長，副科長想升科長，科長想升副处長，副处長想升处長，处長又想升副局長，副局長又想升局長，……官职太多，而想升的人太多，这个問題不能解决。

他說：流行的人物一般看得很近，今天能談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事情的很少，你年龄还青，可以多在思想方面用些工夫，还是超脱一些好。

十二、6月15日上午光明日报召开社务委員会，我因身体不好，原打算不去，那天早上八时半打电話給章伯鈞，向他請假，同时我說："昨天人民日报載，你說我的發言稿罗隆基看过，沒有此事，弄錯了。"（那天后来我还是出席了社务委員会）

十三、6月19日中午，章打了一个电話給我，說打算再开一次光明日报社务委員会（15、16已开过兩次）他要我准备一下，把許多事情談一談。

以上是我所能想起的，我在最近一个时期和章伯鈞来往的一些內容。

（附注：7月4日人民日报所載章伯鈞在农工民主党上的談話，其中有关光明日报的，有些不是事实。他說，我曾表示等把光明日报的情况弄清后再考慮整个改組問題，我沒有說过这样的話，也沒有这样的意見。他又說罗隆基和我談过光明日报的办报方針，也無此事。我和罗仅5月19日談过一次，談話內容已見第一个材料。）

（7月4日記）

三、写的信

我現在把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間（四月一日至六月八日）对外写过的信件，就能够追記得起的，交代如右：

一、①去年夏天胡乔木同志要求我去光明日报时，曾这样說，我过去在編"观察"时期，联系了一批知識分子，他說將来去光明日报以后，可以繼續把旧日的朋友联系起来，鼓动大家多写写文章，多說說話。（乔木同志还說，我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約几个到光明日报去帮助我）我到光明日报以后，和社內同志交談中，大家也認为报社过去联系作者的工作比較差，希望加强。原总編輯常芝青同志也謙虛地表示过，說他过去和大学教授們来往較少，希望我来后，在这方面可以着手进行联系的工作。

按照光明日报的性質，联系作者可以分作兩个方面，一是民主党派成員，二是高級知識分子（二者有一部分是交叉的。）我初去光明日报时，主要是向社內同志了解情况，交換对改进工作的意見，后来关于改进工作的方案决定后，开始考虑和民主党派方面及教授作者方面进行一些接触。（但我在四月七日已去过北大一次）曾經先后向民革、民进、农工等党的中央宣傳部長提出，要求各党派推荐一个写文章人士的名單，以便我們分發信件征稿，进行联系。另外，我自己打算先就相熟的朋友，發一批信約些稿子。这个意思曾和光明日报总編室主任高天同志（党員）說过，高天同志还催过我早日把約稿信發出，因为六月十日即將改革版面，希望能約到一些文章。我在五月底把信的草稿写出后，先請高天、黃卓明兩同志（黃系总編室秘書）看过一次。这封信是用印刷印好的，剛巧一張信紙，信稿我手边沒有，报社內还有，可以查看。这批信是在六月三日前后發出的，当时發給下列各位：

周炳琳　周培源　魏建功　游国恩　馮　至　高名凱　楊人楩
翦伯贊　黃子卿　王鉄崖　龔祥瑞　金克木　陈振汉　徐毓枬
季羡林　向　达　邵循正　侯仁之　張宗炳　严仁赓　芮　沐
錢偉長　王遵明　吳恩裕　張志讓　費孝通　潘光旦　程希孟
严景耀　雷潔瓊　馮符宾　楊东蓴　錢端升　楼邦彦　陶孟和
竺可楨　袁翰青　黃渭川　叶君健　李純青　郑振鐸　戴文葆
于家駒　薩空了　陈夢家　夏　鼐　陶大鏞　黃藥眠　楚図南
叶篤义　翁独健　胡先驌　梁漱溟　郑林庄　陈友松　何永佶
陈体强　吳景超　郑伯彬　徐　盈　彭子冈　李俊龙　錢昌照

林汉达　吳作人　張明养　刘思慕（以上北京）
宦移今　盧于道　王恒守　張　銳　沈志远　王造时　周谷城
徐中玉　傅　雷　胡煥庸（以上上海）
袁昌英　楊端六　韓德培　馬哲民（以上武汉）
高覚敷　陈鶴琴　吳貽芳（以上南京）
陆侃如　馮沅君（以上青島）
陈序經（广州）
梁園东（山西）

②上面这些是一般的征稿信，考虑到六月十日要改版，希望能在短期內收到几篇稿子，所以在有几封信里，我又另外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內容大致如左：

××兄（或先生）

光明日报六月十日改版，希能日內惠文一篇，以光篇幅，务祈賜允。此致

敬礼

附我短信的收信人是袁翰青、金克木、楊人楩、錢偉長、彭子岡、王恒守、袁昌英等。（可能还有一兩位，已記不起来）

③只有在附給王恒守的短信里，我是出了題目的，希望他就高等教育或党群关系写篇文章。

二、我在五月二十二日以后的半个月中一共給清华大学的錢偉長写过四封信，各信的內容是：

①五月二十二日一信，告訴他我打算在五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去北大，順便想去清华看看他，請他告訴我，那一天什么时候去看他比較方便。

②六月三日一信，是上面所說的約稿信。

③和我發約稿信的同时，錢偉長把他的太太和周培源太太兩人合作發現的一篇小品文名叫"石室施氏食獅史"寄給我，希在光明日报刊出，我当时复了一信，信的內容我还記得：

偉長兄：妙文眞妙，下周可刊出。这样的妙文欢迎續惠。

④后来我把此稿給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同志和科学部主

任陈季子同志看时，潘文彬同志建議，最好把“石室施氏食獅史”一文的出处發表时一并注明。我覺得潘文彬同志的話很对，所以又写了一封信給錢偉長、請他轉告他的太太，把該文的出处告我，以便于發表时一并注出。（此信錢偉長未复，“石室施氏食獅史”原稿存光明日报潘文彬同志或陈季子同志处）

三、在五月二十二日給錢偉長一信的同时，我又写了一封給北大的楊人楩和張宗炳。五月十二日（星期日）我和家人去頤和园，在公共汽車上遇到張宗炳夫妇，他們約我在五月下旬去他家玩，看他家盛开的月季，又說，如去，早几天写信通知一下。我四月七日去过北大一次，看了几个朋友，本来打算在五月中旬再去一次，看另外几个朋友，所以我五月二十二日写信告訴張宗炳，說我打算二十六日去北大，意思就是說打算在他那兒吃飯。

另外給楊人楩的信是告訴他我二十六日去北大，可能去看他，但不在他家吃飯（五月七日一次我去北大时，是在楊人楩家吃飯的）

四、五月初旬或中旬（确月不忆）我給上海复旦大学的盧于道写过一封复信，因为據盧于道說，光明日报的上海記者曾約他写稿，故写了一稿寄来，（寄給我）后来社中同志看了，都覺不大合用！我写信通知盧于道，此稿不大合用，稿另由社中寄还他。

五、五月初旬（确日不息）写了一封給上海复旦大学笪移今，因为在上海的光明日报記者曾巴波报告，他們曾約笪移今写一稿，笪有允意，要我再去催一下，我即去信催笪执笔。

六、五月初旬（确日不忆）給上海复旦大学的王恒守复过一信，因王恒守給九三社訊出了几个题目，同时我順便告訴他我已辞去九三社訊主編一职。

七、在五月里，我复过兩封信給太原师范学院的梁園东，因为他投来一稿“出版机关和百家爭鳴”，我第一信是告訴他来稿可以在光明日报發表，后来他又来信要修改几句話，我第二信是告訴他已代修改了。

八、在五月中下旬，我給武汉大学的韓德培复过一信。光明日报派到武汉去的記者約他写稿，他写了一篇“为法学創造爭鳴的条件”寄我，我复他此稿可以刊出。

九、在五月十五日前后，我写了一信給章伯鈞，向他报告我自四月二十二日去信时那一段时間的工作，关于光明日报派記者到九个大城市开座談会事的情，也就是在这次信中报告他的（关于我和章伯鈞的来往，我已于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向九三学社中央整風小組作了交代）

十、五月十七日，我写了一信給罗隆基，說我打算在五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半去看他（关于我和罗隆基的来往，我已于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向九三学社中央整風小組作了交代）

十一、在五月中（确日不忆）写过一信給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周子亚，告訴他他前次投来的一稿已轉新建設杂志，說光明日报因篇幅关系，純粹学术性的文章暂难采用。我还向他打听一个熟人，从事翻譯工作的許汝祉的情况。

十二、在五月下旬，給上海的王造时复了一信。据王造时来信說，在上海的光明日报記者曾約他写稿，他說很忙，所以把他在文匯报上發表的"把鳴放重点放到基層去"一文寄我，希望光明日报"全文轉載"。我复信告訴他，光明日报正在改进內容，轉載文匯报已給發表过的文章，不大好，所以不再轉載，欢迎他另外写文章。

六月三日，王造时將他在上海市政协全体会議上的發言"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一文寄我，希望在光明日报刊載。他一連来过三封信，第一封是仅寄發言稿（印刷品）而忘了附信，第二封是附了一封信。大概在六月六、七日前后，又来一信，希望他的發言能够刊出，我一直到八日离开光明日报时，并沒有采用他的發言稿。我提出辞职后，簡單地复了他一信，說我已辞去光明日报的工作了。

十三、在五月底，我一連給国务院参事室范朴齋写过三次或四次信，主要是处理他投来的一篇"会外之音"文章，原文有八千多字，很不好处理。先退給他，請他自己删，他删成七千字。第二次又由我删成四千字。因为删得太多，所以送給他看一下。后来关于大标題小标題又征求了他的意見。

十四、六月初，我給光明日报上海記者站主任盧云同志（党員）写过三封介紹信，一封介紹他自北京去南京时，訪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任高觉敷，請其协助解决光明日报的南京記者問題，另兩封信是介紹他往訪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付主任貿穆今及該分社秘書处的馮覃燕，請他們在工作上帮助盧云同志。

十五、六月八日，我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錢基博投来的一封信轉給胡乔木同志。

（在此期間，我还写过信給作家协会办公室、少年兒童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新华書店的經理刘子章、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孙承佩、中宣部林默涵同志、文化部文化局的王副局長等，都是私人事件）

（六月三十日記）

四、儲安平的簡历

儲安平，男，48岁，江苏宜兴人，家庭出身：不詳，本人成份：自由职業者。九三学社成員。担任九三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并主編九三"社訊"。

1928—1932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讀書。儲在大学时期，和当时在光华任教的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罗隆基、潘光旦等人都相識，在三、四年級时，与罗更較接近。

1933年夏，由伪中央日报社社長程滄波的同乡、儲在光华大学的同学楊子英介紹，出任伪中央日报副刊編輯历时三年。1936年因其妻与程滄波的桃色事件，乃去英国讀書，1938年夏由英回国，仍去伪中央日报工作，任撰述委員，主要負責編輯国际新聞，直到1939年夏。儲安平在此期間和国民党的張道藩交往甚密，儲到英国讀書，曾托張道藩向江苏省教育厅說項，得了教育厅的一千元补助費，1936年冬張又托儲妻給了儲二百元。1938年儲在重庆伪中央日报时，張在重庆伪中央政治干校任教务長，1939年春張曾介紹儲到中央政治干校研究部工作过一年，与CC分子周子亚合搞一刊物"新評論"，儲任主編，周任經理，由中国文化出版社發行。同时期儲又兼任重庆复旦大学新聞系教授一学期。

1940年秋—1945年夏，儲应湖南藍田国立师范学院院長廖茂如邀請，在該校任教。在这个期間，儲曾接到国民党伪中央宣傳部匯寄的一笔医藥补助費。

1945夏应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杭立武的邀約，赴重庆任該会秘書。在同时期，儲受張雅琴的約請曾主編过一个"客观周刊"。

1946年夏去上海籌办"观察"，任主編，鼓吹"第三条路綫"。在此期間，与蔣介石"侍从室"干部沈昌煥及国民党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李惟果等均有往还。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乃由滬抵京。直到解放。

1949年9月参加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議，1950年夏在新华書店总店任副总經理，1952年夏任中央出版总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8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7月以"新观察"特派記者身份駐新疆采訪。1957年4月任光明日报总編輯。

五、附　　件

一篇惡意攻击文字改革的未刊稿

我最近看到一份材料，是一篇惡意攻击文字改革的未刊稿。稿子原来的題目叫“‘拼音文字’能通用么？”，稿子寄給儲安平后，儲安平另給起了一个惡毒的标題，叫做“公开征求拼音專家，請將左文譯成拼音文字”，决定在6月10日“光明日报”改版时刊出。改版前夜，右派陰謀开始暴露，这篇妙文也就沒有發表。現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請大家看看这类高級知識分子的水平究竟高級不高級，他們对文字改革的批評究竟有沒有半点学术的味道，而右派分子互相串連，破坏文字改革的陰謀又是何等陰險卑劣，原文如下：

“公开征求拼音專家
請將左文譯成拼音文字”

我們堅决反对汉字拼音化，因为汉字拼音化有很多缺点，不符合我國語言文字發展的特征。为了証明我們的意見，現在抄奉短文一篇，要求公諸报端，大家欣賞。并且公开征求拼音專家將它譯成拼音文字，看看究竟能不能讀通。

附短文：

施氏食獅史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时时適市視獅，十时氏適市，適十碩獅適市，是时氏視是十獅，恃十石矢势使是十獅

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是十獅。食时，始識是十碩獅尸，实十碩石獅尸。是时氏始識是实事实。試釋是事。

右派分子乱凑一些念拼音的汉字同音字来为难拼音文字，但是完全扑了一个空！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常識的人都知道，拼音文字是拼写“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的，只有普通話才是“我国語言文字發展的特征”。右派分子把这种狗屁不通的乱拼成的短文拿出来攻击文字改革，只是说明他們愚蠢無知得可笑，同时也是对祖国語言文字的侮辱。要是一个外国人真的相信这篇短文是“中国語言文字發展的特征”的話，那人家一定会把汉語看成一种最最原始、最最低級的語言的。

正像这篇短文中昏了头的“詩士”一样，妄想吃十只獅子，而且妄想用十根石头的箭来使十只獅子“逝世”結果一咬，獅子是石头的。我看这位“詩士”是同样昏了头的右派野心家們的最好的自我写照！

（光明日报編者說明：这篇惡意攻击文字改革的短文，是右派分子錢偉長的夫人寄給儲安平的，儲安平亲自作了挑撥性的惡毒标題，要在6月10日改版后在光明日报上發表并給錢偉長写信說：这样的妙文欢迎續惠）。

人民文学出版社金滿城給儲安平的信

安平吾兄：

多年不見，甚願能有一談之机会，奈彼此皆忙，徒喚奈何！

我原在总工会工作，五四年已調往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来本社进行整風，揭露問題甚多而且很有价值。本社同志們，都以为大可公諸报端，苦無門路。弟思兄所主持之报紙，近来仗义直言，深得多人欽佩。故望兄能商之貴报外勤部，派一外勤記者来本社采訪一下，弟敢保証，絕不虛行。其他一切，当候記者来时，再为詳告，知道你忙，故不多贅。此祝

节禧！

弟金满城　5月30日

（光明日报編者說明：儲安平接此信后，立即指令本报文艺部派記者前往采訪。因所談內容多系肅反和人事問題，文艺部同志認为不宜报道，向儲彙报，儲却一再向文艺部副主任張常海和記者黎丁催促，要作报道！）

盧于道給儲安平的电报

儲安平：

校委会制，复旦有此方案，但未实行。

于　道　6月4日

（光明日报編者注：儲安平于6月2日一手主持刊登出“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假新聞后，6月4日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正确报道，儲却認为这是人民日报故意与他为难，打电报給上海盧于道对証事实，盧即發来此电，而此时儲安平却仍置事实于不顧，复于6月6日登出更加混淆視听的第二次假报道。）